

近三十年來日治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顏杏如*

本文回顧近三十年來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史研究的成果，點描臺灣與日本學界在研究課題、研究取徑上的流變，以及其間交織的外在政治社會之變動、內在研究問題之克服。同時，觀照研究社群的動向、關注的核心問題，及其所帶動的影響與知識生產之關係。文中指出，1990年之後，臺灣方面明顯可見對過去官方民族主義與二元對立史觀之挑戰，對於「近代化」、「主體性」的關心也在此浮現；日本方面則興起了臺灣研究與日本帝國史研究。2000年以後，跨國的研究交流圍繞著「殖民近代性」的概念展開豐碩的成果，但不同主題的切入也折射出較「殖民近代性」更複雜的樣態。隨著民間史料採集、口述歷史的推展，以及日本帝國史反思等動向，無論臺灣或日本學界，都轉換了研究視角，更注重臺灣在地社會的對應、不同歷史行動者之間的關係。相對於明確可見的收奪和壓制，也探向幽微不顯卻滲透至生活中的各種權力、規訓與知識霸權，並重考知識生成之脈絡及其與治理性的關係。文末則借用莎拉·瑪札《想想歷史》中的「誰的歷史」、「何處的歷史」、「什麼的歷史」，檢視日治臺灣史研究的累積與變化之軌跡，以此確認現時研究成果所在的位置，期與讀者一同思索未來前進的方向。

關鍵詞：臺灣史、日本帝國史、學術社群、知識生產、研究回顧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1980年代後半開始，隨著解嚴前後的社會運動與政治民主化，臺灣史研究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特別是此前乏人問津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吸引研究者的目光，並開拓了多元的議題。這些議題的開拓，一方面是對未知領域的探勘，一方面則有著對現實社會的關懷。

關於臺灣史研究的回顧，在不同的研究發展階段都有相關的成果檢評，標示了在每一個階段所面臨的處境與課題。¹此外，自2008年開始，中研院臺史所與政大、師大臺史所每一至兩年皆合辦「臺灣史研究的回顧」研討會，介紹年度的新研究成果。²張隆志亦曾追溯臺灣史研究的學術系譜，指出其與日本殖民地史、中國地方史、西方區域研究等不同學術傳統之間的匯流；日治臺灣史研究在戰後到1980年代之間，因中國地方史的論述框架而出現了斷裂；1980年代晚期以後，議題逐漸多樣化，並受到後殖民理論影響等整體的動向。³

¹ 如：《臺灣史研究》編輯組，〈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1：1（臺北，1994），頁13-23。許雪姬，〈臺灣史研究三部曲——由鮮學經顯學到險學〉，《思想》，16（臺北，2010），頁71-100。關於日本方面研究成果的回顧與討論，可參見每年《史學雜誌》五月號對於前一年度歷史學界的回顧與展望，以及日本台灣學會『日本台灣學會報』編集委員會，《日本台灣學會報》，11（東京，2009）、日本台灣學會『日本台灣學會報』編集委員會，《日本台灣學會報》，21（千葉，2019），此兩號分別為日本臺灣學會創立十週年與二十週年的紀念研討會特輯。

² 歷年的議程與研討會論文，見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網站，<http://thrrp.ith.sinica.edu.tw/index.php>，擷取日期：2019年11月20日。又，每年發表者報告後投稿的正式文章多刊於《臺灣史研究》、《漢學研究通訊》，由於篇數眾多，在此不一一列出。

³ 張隆志，〈國家與社會研究的再思考——以臺灣近代史為例〉，《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4（臺北，2006），頁107-128。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

聚焦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臺灣史，若林正丈曾在 1990 年代初，從政治過程、抗日鬥爭史、經濟過程、文化與社會等等項目，詳細回顧臺、日、西方的研究成果。⁴2008 年，日本殖民地研究會亦曾依課題(帝國主義論、後殖民主義)及地域(朝鮮、臺灣、樺太、南洋群島、滿洲)整理日本殖民地研究隨時代變化的軌跡與研究方向。其中，「臺灣」一章，在回顧臺灣史研究的發展與地位的確立後，依政治、經濟、教育、文學等各領域介紹日本的研究成果。⁵

上述張隆志與若林的回顧主要著墨於 1990 年代中期以前的研究，1980 年代晚期以後，研究課題出現的內在突破、延續性及其後的變化，是今日得以進一步探問、回顧的課題。而日本殖民地研究會的討論，則以日本的研究成果為主，並從日本內在的研究課題及日本研究者的角度，論臺灣史研究的地位及研究者應採取的姿態——如何兼具獨立性，同時與日本近代史互補接合等問題。然而，臺灣研究者獨有的視線與關懷、學術研究內外所處的環境、跨界的學術交流及其影響等，仍有待我們從臺灣的角度出發檢視。

基於前述，本文不打算網羅式地回顧，而是聚焦在臺灣史研究中較晚登場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點描式地著重於近三十年來，研究課題、研究取徑上的流變，以及其間交織的外在政治社會之變動、內在研究問題之克服。同時，觀照學術社群的動向、核心關懷，及其所帶動的影響與知識生產之關係。不過，當聚焦在這樣的方向上，自然也

論綱》，《臺灣史研究》，16：4(臺北，2009)，頁 161-184。

⁴ 若林正丈，〈台灣殖民地支配〉，收入山根幸夫等編，《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入門》(東京：研文出版，1992)，頁 277-311。(此文有洪雪吟、許佩賢兩個版本的中譯文，1993)。

⁵ 日本殖民地研究会編，《日本殖民地研究の現状と課題》(東京：アテネ社，2008)。

不免受到筆者個人的研究興趣、偏好，身處的時代與研究社群的影響，這也是這篇研究回顧的侷限。此外，臺灣史研究自發展之初，一直具有跨學科的性質，隨著研究臻於活潑成熟，一些研究主題也形成專門領域，如文學史、藝術史、法律史等等。限於研究討論的篇幅與筆者的能力，未將其納入，僅提及少數與本文論點相關的跨學科研究成果，並將聚焦勾勒以歷史學界為主的研究軌跡與變化。

從本文開始寫作的 2019 年，回望三十年前，恰是標示世界劇烈變動的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象徵冷戰結束；網際網路發明，改變了人際疆界的關係距離；臺灣則是解嚴後兩年，但爭取言論自由、民主化運動仍是進行式。在學術界，1988 年中研院設立「臺灣史田野研究室」，1989 年起由院方編列預算，象徵臺灣史研究開始邁入正規化的階段。⁶1990 年，《新史學》創刊，發刊詞中提及了外在政治環境的變動，以及每一個時代皆有新史學，顯示刊物作為新時代史學實驗場的企圖心——解決過去所未能解決，以及新時代中所產生的新問題。⁷《新史學》的創刊，也標示了史學界的脈動——抱持著探索可能性，開拓邊界的心態，在方法、敘述、分析、議題上創新的嘗試。在這些國際情勢與臺灣內部政治社會、學術環境的變動中，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臺灣史研究又出現了什麼樣的研究動向，產生了什麼樣新的課題？

本文討論的範圍，包含臺灣與日本學界的主要動向。將日本學界也納入討論，除了臺灣研究者的研究回顧中較少論及 1990 年代後日本學界的動向之外，日本學界是日治臺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重鎮，且無

6 關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的成立經緯，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網站，〈本所介紹〉，<https://www.ith.sinica.edu.tw/about.php?l=c&no=15>，擷取日期：2019 年 11 月 20 日。

7 〈發刊詞〉，《新史學》，1：1（臺北，1990），頁 1-4。

論在研究者的培養、資料的運用、研究成果的翻譯上，與臺灣學界之間的關係極為密切。

文末，筆者也嘗試提出一些反思，作為在這個時間點上面對當下課題的一些想法。但更重要的是，希望透過本文的回顧，檢視研究累積之軌跡，以此確認現時研究成果所在的位置，並邀請讀者一同思索未來前進的方向。

二、興起與挑戰：1989年-1999年

(一) 1989年以前：研究的伏流

1980年代以前，臺灣學術界的臺灣史研究，基本上是在中國地方史的脈絡或鄉土的視野中進行；西方學者則以清代臺灣史作為中國研究的一環。在此背景下，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漢人社會及其與中國的關係，日治時代的歷史並不受重視，出現了研究上的斷裂。⁸此時與日本時代相關的著述大多是由經歷日本統治的當事者所撰，在戒嚴的時代背景下，強調政治、文化運動上「民族主義」抗日的面向，以及與「祖國(中國)」的連結。⁹《臺灣風物》(1951-)、《臺北文物》(1952-1961，1962更名為《臺北文獻》發行至今)等等刊物上，亦時有經歷殖民統治者對戰前社會文化的記述。儘管屬於非學術性的著作，但透過資料的整理與自身記憶的陳述，為後來的研究者留下了當事人的見證，也成為日後研

⁸ 張隆志，〈國家與社會研究的再思考〉，頁107-128。

⁹ 如：謝里法(1938-)，《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臺北：藝術家出版，1981)。呂訴上(1915-1970)，《臺灣電影戲劇史》(臺北：銀華出版部，1961)。蔡培火、林柏壽、陳逢源、吳三連、葉榮鐘著，《臺灣民族運動史——日據時代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叢書編輯委員會，1971)。

究的線索與對象。

在日本學術界，1960年代以前，對殖民統治的歷史關心稀薄，相關研究十分欠缺。1970-1980年代初，殖民地歷史關聯的書籍逐漸增加，然而對臺灣的關注仍相對稀少。¹⁰不過，在1960年代，相對於臺灣國內政治的束縛，海外臺獨運動者嘗試重建臺灣史發展的脈絡。其關注殖民統治的本質、臺灣人的意識與反抗精神，也左右海外留學生的思維，影響1980年代以後國內的臺灣史研究。¹¹1970-1980年代，學術上的研究，主要是由1930年代出生，在戰後的1950年代從臺灣到日本留學的世代擔綱；¹²研究會的組成，也為日後在日本的臺灣研

¹⁰ 戰後日本的社會科學、歷史學亟欲解決的課題主要集中於日本的帝國主義、天皇制，以及法西斯本質的解析。對於殖民地的研究，則因喪失殖民地、希望忘卻過去的社會心理，以及史料的限制等，導致研究動機欠乏，以致1960年代以前，日本的殖民地研究呈現停滯、低迷的狀態。1960年代後半開始，隨著日本經濟復興邁向成長期，過去殖民地韓國、台灣為中心的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抬頭，以及基礎史料的公開、整備，關於殖民地的歷史研究在質量上逐漸增加。參見：岡部牧夫，〈帝國主義論と殖民地研究〉，收於日本殖民地研究会編，《日本殖民地研究の現状と課題》，頁19-54。檜山幸夫，〈日本における台湾史研究の現状と課題〉，收於台灣史研究部會編，《台湾の近代と日本》（名古屋：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3），頁15-66。外村大，〈戰後日本における朝鮮殖民地支配の歴史認識〉，《神奈川大学評論》，81（神奈川，2015），頁83-90。

¹¹ 參見：張炎憲（1947-2014），〈日治時代臺灣史的研究定位〉，《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6（臺北，1993），頁10-14。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頁161-184。

¹² 如，許世楷（1934-），《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抵抗と弾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2）；涂照彥（1936-），《日本帝國主義下の台湾》（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5）；黃昭堂（1932-2011），《臺灣總督府》（東村山：教育社，1981），該書中文版於1989年出版。另一方面，也有少數殖民地經驗的日本人對民族運動史的整理。如向山寬夫，《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民族運動史》（東京：東京中央經濟研究所，1987）。向山生於1914，小

究埋下種子。¹³這段時期，主要的研究課題為霧社事件、殖民政策、政治運動等。研究者受到日本戰後史學的影響，在經濟上強調殖民母國與殖民地之間壓榨、從屬關係，在政治上則著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壓制、抵抗的關係，以此批判日本帝國與殖民主義。

1980 年代起，未經歷日本殖民統治的戰後世代之臺日學者，將學術研究重心放在殖民者的統治政策、制度；圍繞著「抵抗」的被殖民者之動向；政權更迭之際社會領導階層的對應等議題上。但除了二元對立的敘述方式及強調民族主義之外，研究的內容也出現了一些新的關懷。以臺灣的研究者來說，在武裝、非武裝抗日運動的研究上，雖不否認這些運動帶有民族主義的性質，但也有研究者開始關心「民族主義」以外的面向，如社會經濟面上與清代以來長期結構性的關聯；政治運動上具有爭取近代式政治權利的性質。¹⁴日本的研究者則傾向關注日本本國政治體制的動向與殖民地統治體制兩者之間的連動，並指出總督府在確立統治權力的過程中，存在著「透過交換、仲介進行控制的機制」、

學中學在臺北度過，該作原為 1961 年向九州大學提出的博士學位論文。

¹³ 戴國輝(1931-2001)在 1970 年代與青年研究者組成「臺灣近現代史研究會」(1978-1987 年，前身為 1970 年的「東寧會」)，參加者有：若林正丈、松永正義、河原功、春山明哲等等，多為後述日本臺灣學會的創立者，此外也有臺灣留學生加入。研究成果出版有：戴國輝編著，《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と資料》(東京：社会思想社，1981)；台灣近現代史研究会編，《台灣近現代史研究》，1-6(東京，1978-1988)。詳見：春山明哲，〈戰後日本的臺灣史研究——回顧「台灣近現代史研究会」〉，收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臺北：播種者文化，2004)，頁 23-61。

¹⁴ 翁佳音，《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6)。周婉窈，《日據時代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

「透過規律、訓練進行控制的機制」等更複雜的關係。¹⁵

換言之，1980年代雖仍關心統治上的政治結構、經濟上的收奪壓榨，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抗日運動、民族運動這些屬於二元對立、官方中國民族主義下的經典主題，¹⁶但一些研究者的研究重心、視角已出現了些許變化——臺灣研究者逐漸鬆脫官方中國民族主義的束縛，而日本研究者則是開始鬆動二元對立的論述方式。

(二)1990年之後：對官方中國民族主義與二元對立史觀的挑戰

隨著民主化、本土化等外在政治社會的變動；年鑑學派等文化史、社會史研究取徑對史學界的影響，以及臺灣史研究本身存在大量空白

¹⁵ 若林正丈，《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83，增補版 2001）。此書中文版 2007，全新增補版 2020。春山明哲、若林正丈編，《日本植民地主義の政治の展開一八九五-一九三四——その統治體制と臺灣の民族運動》（東京：アジア政経学会，1980）。另參見：若林正丈著、許佩賢譯，〈試論如何建立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的研究——戰後日本研究成果的一個反思〉，收於黃富三等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 273-284。

¹⁶ 此處的「官方中國民族主義」是指中國國民黨政權藉由國家權力形塑用以作為國民統合的意識形態。其中，「官方民族主義」借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詮釋：「一種把民族那既短又緊的皮膚撐大到足以覆蓋帝國龐大身軀的手段」。若林指出，中華民國繼承滿清疆界，並意圖在此疆界上建立一個近代國民國家，作為帝國，其形成路徑雖和安德森所舉的帝政俄羅斯和日本殖民帝國不同，卻是一種「國民帝國」——追求帝國式的國家結構，以某種形式統合異民族領域。在臺灣政治中，構成「官方中國民族主義」論述的要素，在歷史記憶上，包含了八年對日抗戰及其勝利。參見：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 1-75、329-370。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1999），頁 95-124。

所產生的內在動力，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臺灣史研究成為 1990 年代最受研究者矚目的領域。

1980 年代中葉，官方中國民族主義的敘述方式與二元對立史觀的鬆動，散見於個人的著作中。到了 1990 年代以後，則出現更具體而明確的反思與提倡，影響了後續的研究方向與歷史敘述。1990 年《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刊載了曹永和(1920-2014)的〈臺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文中認為過去的臺灣史太注重政治的變遷與漢人的觀點，然而歷次政權的更迭往往非關人們的意願，且島嶼上有著複雜多樣的人群活動，因而主張跳脫國家單位，朝人民的、區域的歷史發展——「在臺灣島的基本空間單位上，以島上人群作為研究主體」。¹⁷「臺灣島史」的倡議，在當時挑戰了中國地方史的框架，以及官方中國民族主義的束縛。而此一想法，或為當時一些研究者所共有，又或影響了其他研究者。¹⁸

除了史觀的反思之外，也針對過去研究的內在問題與不足之處進行檢討。1992 年「中研院臺灣史田野研究室」針對日治臺灣史舉辦了一場小型座談會，批判性地重新檢視過去研究中的問題。諸如經濟史延續戰前矢內原忠雄研究理論所根據的列寧式帝國主義之分析，卻未注意到矢內原研究理論的根源，只討論被殖民者受壓迫、剝削的面向，忽略資本主義帶來的「進步性」，以及當地社會經濟結構的自主性；政治運動史往往以中國民族主義的情感進行詮釋，而忽略臺灣人的自

17 曹永和，〈臺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臺灣島史」概念〉，《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5(臺北，1990)，頁 7-9。

18 若林正丈以吳密察、周婉窈、吳叡人為例，說明三人提出的史觀與曹永和「台灣島史」之間的共通性與差異，詳見：若林正丈，〈「台灣島史」論から「諸帝国の断片」へ——市民的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台湾史観一瞥〉，《思想》，1119(東京，2017)，頁 85-96。

主性，以及面對「殖民地化」與「近代化」兩者之間的掙扎矛盾。對於未來研究的方向，則提出應注重殖民地間的比較、臺灣本地對日本殖民帝國的回應等建議。¹⁹事實上，座談會可視為研究進展的集體對話之呈現，在此之前，研究者們已陸續在個人研究中展開一些嘗試來克服這些問題。²⁰

隨著研究視角、框架的突破，以及檔案的逐步開放，研究者開始探討在過去框架、視野下所無法觸及的問題，特別是在官方中國民族主義史觀下被排除的人群。1970年代以來西方學術界「由下而上」的新史學，挖掘過去不被重視的題材、正史中缺乏相關文字史料的「無聲者」、少數底層的歷史。在日治臺灣史研究上，這樣的新史學要到解嚴以後的1990年代才展開，關心的對象是那些在解嚴前被掩蓋的、噤聲的記憶。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關於臺籍日本兵的研究。

1974年，戰前被送往海外從軍的臺籍日本兵被發現，成為臺日社會關注的新聞報導。在旅日學者王育德(1924-1985)的發起下，1975年成

¹⁹ 張炎憲、吳密察、柯志明、陳芳明、林瑞明、吳文星座談，柳書琴、許佩賢紀錄整理，〈日治時代臺灣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6(臺北，1993)，頁15-47。周婉窈也曾在1989的著作中提到：「社會與經濟結構也在強大的殖民母國的催化下，展開了兼具殖民地化與近代化的歷程」。周婉窈，《日據時代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頁5-15。

²⁰ 例如，柯志明探討殖民者在殖民地創造出來的結構本身之限制、矛盾，及在此限制矛盾下，殖民地經濟社會的自主性，其與日本國內資本再生產之間的雙向互動關係，而其研究成果陸續發表於1989-1992年之間。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台北：群學台北市：群學出版社，2003)，其書改寫自1995年英文版 *Japanese Colonialism in Taiwan: Land Tenure, Development, and Dependency, 1895-1945*。王泰升考察西方式法律的引入、繼受，及其對臺灣社會民事法律生活產生的影響，其背後也探問臺灣社會是否僅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延伸，其獨特性如何形成。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該書源自1992年完成的博士論文。

立「臺灣人元日本兵補償問題思考會」，展開向日本政府求償的行動，直到 1992 解散。此間，前臺籍日本兵、軍屬的回憶錄、報導文學陸續出版。²¹這些動向也刺激了學術研究的展開。1993 年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成立之初，便舉辦多場座談；研究院內外的研究者們進行口述歷史的訪談、紀錄、出版，並展開學術性的研究。²²

不僅止於對臺籍日本兵的關注，皇民化運動、戰爭動員亦是此一時期開展的新研究主題。當政治禁忌解除之後，研究者們開始探討作為殖民地的臺灣，在戰爭下如何動員人力、物力、人心；其為政治、經濟、社會結構造成的影響。²³「日本化」的「心靈」也成為研究的課題。周婉窈分析教育、教科書，以及涉及生活諸多層面的皇民化運動，探問「戰爭期世代」的國家觀念、意識如何被養成，以及其在國家疆界、主權變動下的處境。²⁴臺籍日本兵、從軍看護婦、青年團等

21 如：加藤邦彦，《一視同仁の果て——台湾人元軍属の境遇》（東京：勁草書房，1979）。磯村生得，《青春不再來——一台湾人の従軍記》（東京：磯村生得，1978）。磯村生得，《われに帰る祖国なく——或る台湾人軍属の記録》（東京：時事通信社，1981），中文版出版於 1996 年。

22 如：鄭麗玲採訪撰述，《臺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板橋：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周婉窈，〈日本在臺軍事動員與臺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1937-1945)〉，《臺灣史研究》，2：1（臺北，1995），頁 85-125。蔡玉慧編著，吳玲青整理，《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23 近藤正己，《総力戦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中文版出版於 2014 年。蔡錦堂，《日本帝國主義下台湾の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楊雅慧，〈日據末期的臺灣女性與皇民化運動〉，《臺灣風物》，43：2（臺北，1993），頁 69-71。林繼文（1964-2018），《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板橋：稻鄉出版社，1996）。

24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3）。本書收錄的論文多發表於 1990 年代，主題涵蓋了皇民化運

圍繞著戰爭時期的集體經驗，是此一時期最受矚目的議題。原本在中國地方史、官方中國民族主義視角下被忽視、排除的記憶與經驗，從噤聲到可以言說，從被掩蓋到可以紀錄。

在上述史觀的變動下，研究的對象也擴大了，探照燈照到同在島嶼上活動的另一族群——日本人。只是此時主要仍在「殖民政策」的脈絡下，考察農業移民事業之展開。²⁵不過，政治史的研究者們開始細緻地檢驗殖民地社會中的不同人群，以及各種勢力的角逐——在臺日本人與總督府官方未必站在同一陣線，其間存在不同的派閥；與總督府之間也有著既合作又對抗的樣態。²⁶整體而言，研究主軸雖延續了傳統經濟史、政治史的主要關懷，但新研究對象的切入，凸顯了社群內部的複雜性，以及族群間摩擦、融合等社會文化的面向。

除了源自傳統帝國主義研究的經濟史、政治史之外，社會史、女性史等也逐漸展露頭角。如呂紹理討論新時間制度的導入帶來的生活作息與社會變遷；游鑑明考察官方女子教育的設立，運用口述歷史勾勒職業婦女的出現；楊翠分析報章中的婦女解放論述，以性別的視角照射出殖民統治下民族、階級與性別多重的壓迫關係。²⁷不過，在這

動、臺籍日本兵、國語教育、教科書等等。

25 鍾淑敏，〈日據時期的官營移民——以吉野村為例〉，《史聯雜誌》，8(南投，1986)，頁 74-84。張素玢，〈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此書新版為：張素玢，《未竟的殖民——日本在臺移民村》(新北：衛城出版，2017)。

26 鍾淑敏，〈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統治權的確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鍾淑敏，〈日據初期在台的日本人〉，《史原》，17(臺北，1989)，頁 211-248。岡本真希子，〈在台湾「内地」人の「民権」論——植民地在住者の政治参加の一側面〉，《日本史攷究》，25(東京，1999)，頁 30-52。

27 游鑑明，《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

段時期，即便是屬於社會史範疇的議題，仍不少可以看到帶著經濟史中收奪壓榨、政治史中壓制抵抗的論述成分。以都市議題為例，多從生產關係、國家力量的介入論都市化，以及經濟社會結構的轉變，但同時，也逐漸將考察面延伸至都市中的日常生活。²⁸

綜觀 1990 年代，議題開始多樣化，除了關注在「抗日」敘述下被排除、掩蓋的臺籍日本兵、臺灣人的戰爭經驗之外，研究取徑開始從傳統的經濟史、政治史延伸至社會史的探究。儘管過去的二元對立史觀並未完全退場，但挑戰、跳脫二元對立史觀的動向更加明顯，進而探問殖民統治內在更複雜的樣態，關於「近代化」、「主體性」的關心也在此浮現。除了大歷史之外，目光開始投向過去被忽視的人群。

(三) 日本：臺灣研究與日本帝國史研究的興起

日本的學術界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前，並未確立「臺灣史」的研究領域，而是在日本近代史、日本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中國史／中日

代史研究所，1994)。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職業婦女〉(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臺北：時報文化，1993)。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8)。

²⁸ 葉肅科，〈日落臺北城——日治時代臺北都市發展與臺人日常生活(1895-1945)〉(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蔡采秀，〈從日治到戰後的臺北(1895-1985)——一個都市性質轉變的歷史過程分析〉，《臺灣史研究》，3：2(臺北，1996)，頁 5-50。陳惠雯，〈大稻埕查某人地圖——大稻埕婦女的活動空間近百年來變遷〉(蘆洲：博揚文化，1999)。順帶一提，更早的 1980 年代中葉有溫振華的研究，從人口成長、官方力量、都市機能、城市中的政治、文化活動等面向概觀臺北的都市化。溫振華，〈二十世紀初之臺北都市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6)。

關係史的範疇下研究臺灣。前述若林的回顧收於《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入門》一書，便透露 1990 年代初討論臺灣歷史時，仍是在中日關係史或中國史的範疇下進行。²⁹然而 1990 年代以後，出現了新的動態，一是臺灣研究成為新領域，二是日本帝國史研究的興起。

冷戰結束為日本史學界帶來了衝擊。無論是世界史或東洋史都開始思考如何從「地域」或亞洲的視角跳脫歐洲中心觀。就日本史而言，嘗試擺脫「國別史」的框架，探問地域間的關係，成為 1990 年代的新課題。1993-1995 年東大出版會出版《從亞洲思考(アジアから考える)》系列全七冊的論叢，以及 1997-2000 年山川出版社出版的十二卷《地域の世界史(地域の世界史)》，象徵了此一新動向。在這些書系中，「地域」並非固定的概念，而是沿著問題視角浮現的空間對象，並在多面的相互關係中思索其概念；它相對於「國家」、「民族」，也不同於「日本」、「中國」等既有的框架，而是強調其概念的重層性、伸縮性與複合性。³⁰

在「地域研究」的概念下，「臺灣研究」成為一個新興領域，1997 年「日本臺灣學會」成立，學術刊物《日本臺灣學會報》亦自 1999 年開始定期出刊。不過，這並不只是日本學界內部動向的影響，更是由於 1980 年代晚期以來，臺灣在政治、經濟上醒目的變動，吸引了日本研究者的目光。³¹或許可以說，1980 年代以來研究成果的積累，在此時和「地域研究」的概念結合，「臺灣研究」於焉誕生，在日本學術

²⁹ 若林正丈，〈台灣植民地支配〉，頁 277-311。

³⁰ 相關討論見：岸本美緒，〈アジアからの諸視角——「交錯」と「對話」〉，《歴史学研究》，676(東京 1995)，頁 36-47。濱下武志，〈歴史研究と地域研究——歴史にあらわれた地域空間〉，收於濱下武志、辛島昇編，《地域史とは何か》(東京：山川出版社，1997)，頁 16-52。

³¹ 參見：日本臺灣學會官網，〈日本台湾学会設立趣意書〉，<http://jats.gr.jp/shuisho.html>，擷取日期：2019 年 11 月 20 日。

界中開拓出不同於中國史或日本史的嶄新之路。「臺灣」作為「地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對象，並非置於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下的地方研究，而是強調它的獨自性和個性，同時也強調它和周邊多重的關係。³²日本臺灣學會具跨學科的性質，成員涵蓋歷史學、人類學、政治學、文學等等不同學門的研究者；《日本臺灣學會報》中的研究論著則以當代研究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研究成果最多。會員包含不少臺灣人研究者，因而每年的學術大會也架起臺日學術交流合作的橋梁。

值得注意的是，在挑戰、擺脫「國別史」框架之動向中登場的臺灣研究，相對於在日本的中國史、日本史研究，其實也具有不同的意義。1994年，吳密察發表〈臺灣史的成立及其課題(台湾史の成立とその課題)〉一文，批判過去在中國史框架中理解臺灣的歷史，進而思考臺灣史自身的內容和成立的條件，主張在世界史中定位臺灣。這篇文章發表在前述《從亞洲思考》書系中的《來自邊陲的歷史(周縁からの歴史)》一冊。該書系集結的論文意在關注日本、亞洲及其雙向的關係，是以「地域」視點重新打破國家界線的一種嘗試，不過吳密察重新以地域、世界的複眼，描繪的是臺灣與世界的連結線，同時也映照出臺灣自身的位置與邊界。³³

隨著臺灣的民主化、日本臺灣學會的成立等研究的進展，臺灣研究在日本學術研究上地位的變動，也展現在《史學雜誌》五月號年度的回顧與展望中。岡本真希子指出，在2001年以前，臺灣史研究成果是置於「東亞(中國-近代)」的項目下討論；作為殖民地研究，有時也在「日本(近代)」的「殖民地」項目中提及。2002年以後則以「東亞(中國-臺灣)」

32 參見：〈日本台湾学会設立趣意書〉。若林正丈，〈「台湾研究」とは何か？〉，《日本台湾学会報》，1(東京，1999)，頁1-3。

33 吳密察，〈台湾史の成立とその課題〉，收於溝口雄三等編，《周縁からの歴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4)，頁219-242。

的形式獨立出來。不過，儘管在研究史上的位置有著邊界的變動，但日本人研究者大抵採取不涉入統獨、臺灣民族主義等議題，而是嘗試解析此一政治議題是在何種歷史脈絡中形成，進而解析的姿態。³⁴

與殖民地臺灣研究相關的另一個動向是日本帝國史研究的興起。1990年代以前，對日本史而言，殖民地是一個外在的、邊緣的問題。在前述國際情勢變動與學界動向下，1990年代日本史研究也開始重新審視過去的日本殖民地，思考日本帝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岩波講座 近代日本與殖民地(近代日本と植民地)》系列，揭開了此一研究動向的序幕。這套書集結多位研究者的論文，內容涵蓋世界各國殖民地統治、殖民地理論的比較；向內探問「內國殖民」問題、「統合與支配的理論」，橫向則考察「帝國統治的構造」、殖民地的產業、人群的移動、涉及「抵抗與屈從」的殖民地運動，以及戰後的「脫殖民地化」。³⁵不過，在八卷的套書中，關於殖民地臺灣的論著相對地較少，遠不及滿州與朝鮮。值得一提的還有第七卷《文化中的殖民地(文化の

34 岡本真希子，〈殖民地台灣に関する近年の研究動向〉，《日本殖民地研究》，16(東京，2004)，頁46-53。谷ヶ城秀吉，〈第四章 台灣〉，收於日本殖民地研究会編，《日本殖民地研究の現状と課題》，頁121-154。

35 大江志乃夫等編，《岩波講座 近代日本と植民地》全八卷，(東京：岩波書店，1992-1993)。其中與台灣相關的有：近藤正己〈臺灣總督府的「理番」體制與霧社事件〉；若林正丈〈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一九二三年東宮臺灣行啓與「內地延長主義」〉；柯志明〈「米糖相剋」問題與臺灣農民〉；越沢明〈臺灣、滿洲、中國的都市計畫〉；春山明哲〈明治憲法體制與臺灣統治〉；駒込武〈統治異民族的「教義」〉；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與「臺灣籍民」〉；林瑞明(1950-2018)〈決戰時期臺灣的作家與皇民文學〉；田村志津枝〈臺灣大眾藝能的樣貌〉；松永正義〈臺灣的文學活動〉；吳密察〈臺灣人之夢與二二八事件〉，原題皆為日文，筆者譯為中文。從作者與篇名，可以窺見當時研究的擔綱者與主要課題，以及臺日間的學術合作交流，日本臺灣學會的成員也與此多有重疊。

中の植民地)》，編者寫道該卷是書系中最特別的一卷，透露對「文化」面向的關注在此時才剛起步，有別於傳統的帝國主義與殖民地研究。

199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帝國史研究更加活潑化。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日本人>の境界)》等等著作為其代表。在日本帝國史研究的展開中，也重新審視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分析概念。如駒込剖析史料中頻繁出現的「同化」一詞所具有的政治力學；透過分析官僚、知識分子所提出之主張，探討政策背後反映的思想，及其所顯現的統治理念與矛盾，以此探問日本帝國在擴張之路上，日本的民族主義如何建構、重建、變化，如何將人群劃分或排除。這一時期日本帝國史的研究，嘗試橫向地掌握複數殖民地，分析彼此之間在構造上的關聯性，同時，不將「日本人」、「日本文化」視為不證自明的範疇，進而重新檢視，探問其形成、變貌的歷史過程。³⁶

三、開展與深化：2000年～2019年

(一) 圍繞著「殖民近代性」的討論

³⁶ 駒込武，《殖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中文版出版於2017年。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繩、アイヌ、台灣、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歸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1998)，中文版有2011年與2020年兩個譯本。駒込武，〈コメント「帝国史」研究の射程〉，《日本史研究》，452(京都，2000)，頁224-231。另外，吳叡人的博士論文一部分，也與此對話，探討日本帝國的構造與國民統合的方式。Rwei-Ren Wu, “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Ph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3).

在 1980 年代的黨外雜誌上曾展開日治時期「臺灣近代化」的辯論，然而受限於時空環境，並未發展成學術上的解釋概念。³⁷1990 年代，研究者對於「近代化」面向的關注增強，如前述 1992 年座談會的出席者，多認為那是過去受忽視的部分。殖民與近代性之間的關係再次成為焦點，並轉化為用以解釋日治時期社會文化現象的概念，則與 2000 年前後國外學術的研究動向與跨國交流激盪有關。

1990 年代，韓國學界對於日本殖民地政策對 1970 年代以來的高度經濟成長有何貢獻，產生了「殖民地掠奪論」和「殖民地近代化論」的論戰。兩者對於日本殖民統治與朝鮮「近代化」之間的關係，雖有著相反的主張，卻同樣視「近代」為正面的、憧憬的對象；在方法論上，將「近代化」以特定指標分析其變化過程。相對地，1990 年代後半，美國的韓國史學界批判過去「統治」與「抵抗」善惡二元論的觀點，主張殖民地時期的朝鮮乃是處於「殖民性」和「近代性」共存的狀態；導入了「近代性」，探索其與「殖民主義」、「殖民地統治」的關係，提出「殖民近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概念，以此考察韓國近代文化的形成、近代式價值觀的滲透，以及與威權對抗關係中形成的認同意識。在其觀點中，不同於「近代化論」，而開始注意到「近代」本身潛藏的負面內涵，並加以分析批判。³⁸

37 參見：張隆志，〈國家與社會研究的再思考〉，頁 107-128。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頁 161-184。關於 modernization / modernity 有時被譯為近代化 / 近代性，有時被譯為現代化 / 現代性，即便同一作者在不同文章中的譯法也不太穩定，筆者在行文中統一寫作近代化 / 近代性。

38 參見：並木真人，〈朝鮮的「殖民地近代性」、「殖民地公共性」和對日協力——殖民地政治史、社會史研究之前置性考察〉，收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頁 71-112。松本武祝，〈有關朝鮮「殖民地近代性」論點之整理與重建〉，收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頁 113-131。

另一方面，儘管「臺灣近代化論爭」未能發展成解釋概念，但在學術史上除了反映了對19-20世紀初臺灣歷史轉型的解釋和評價之外，也涉及了對「近代化」的基本假設和價值立場。張隆志指出，當時的學者多視「近代化」為發展指標，帶有線性發展的評價標準。而後，隨著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等思潮的興起，近代化理論典範的合理性受到挑戰，討論重心也逐漸轉變為對近代性的批判和反思——相對於發展指標與階段論式的近代化研究，更注重內涵上的多重面向。³⁹

約當同一時期，隨著臺日研究的發展，跨國的新世代交流也隨之展開。1997-2001年若林正丈、吳密察策劃以臺灣近現代史研究者為主的工作坊，從臺大、東大碩博士生逐漸擴大為多校參與者的「日臺青年臺灣史研究者交流會議」（1997-2001），2002年起會議更名為「東亞近代史青年研究者會議」（2002-2004）。⁴⁰會議中，「殖民近代性」屢屢成為討論核心，參加者認為朝鮮史研究中使用的「殖民近代性」對臺灣史研究而言，也是一個有效的分析概念。不過，關於「殖民近代性」的內涵特質，則因研究者的立場與認知方式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如，駒込武強調殖民近代性的特徵為在殖民統治下西洋近代文明滲透過程中

³⁹ 參見：張隆志，〈殖民現代性分析與臺灣近代史研究——本土史學史與方法論芻議〉，收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頁133-160。與此相關的後殖民史學，批判西方啟蒙論述和歐洲中心史觀，重新挖掘在地和邊緣群體的聲音，企圖重建歷史的主體性與多元的觀點，其在台灣的引介與討論，參見：張隆志，〈後殖民觀點與臺灣史研究——關於臺灣本土史學的方法論反思〉，收於柳書琴、邱貴芬主編《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臺灣文學場域》（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359-383。

⁴⁰ 參見：駒込武等撰，〈代序——出版緣起與活動報告〉，收於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頁x-xix。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收錄1997-1999年的成果。《跨界的臺灣史研究》則收錄2000-2002年的成果。

極度不均衡的狀態；張隆志則介紹美日韓學者對於殖民近代性的討論，並嘗試分為區域個案(variations of universal modernity)、缺陷矛盾(incomplete modernity)、統治技藝(governmental modernity)、曖昧交織(hybrid modernity)、另類創新(alternative modernity)等五種殖民近代性研究的分析取向，以此對照 1990 年代日治臺灣史研究的成果；而會議參與者們也各自以不同的主題呈顯「近代」的多樣性。會議的成果出版為《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書名揭示了臺灣在多重外力下近代化的軌跡，以及從東亞的俯瞰視野。

會議中共享的「殖民近代性」概念，也在會議之外展開共同研究。2003 年《亞細亞遊學(アジア遊学)》出版特集「臺灣——摸索中的躍動」，即為其實際成果。橫跨臺日的研究者從不同主題切入「殖民地近代」的兩面性和複雜性。諸如以教育為例，考察臺灣人追求「近代文明」的軌跡，崎嶇路上遭遇的關卡、挫折；報紙、電影等新興媒體隨都市生活、教育普及而發展，既交錯了娛樂與政治宣傳，又扮演了與政治權力對抗的角色。⁴¹這些嘗試，日後又再深化為博士論文或專著。⁴²

換言之，1990 年代初國內學界已有初步的討論，加上 1990 年代晚期國際學術研究的趨勢、跨國的交流激盪，2000 年以後新一代的研究者已不再將殖民性與近代性視為二元對立的問題，而是探究兩者之間糾葛的樣態。

除了交流、合作的成果之外，許多個別的研究也都探向殖民統治與近代性之間的交纏。例如，陳培豐分析國語教育中「同化」的工具

41 《アジア遊学》編集部，〈特集〉台湾——摸索中の躍動，《アジア遊学》，48(東京，2003)。

42 如：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2004)。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

性、兩義性與流動性，並從臺灣人的角度探討其應對方式。相較於此前著重官方「同化」政策的統治邏輯，更強調臺灣人的主體性——對近代文明的渴望、在此展現的積極面向，以及對自身和統治政策造成的雙向影響。⁴³此外，近代公共衛生觀念的遞嬗、醫學如何作為日本帝國的統治工具，如何影響臺灣的社會文化變遷；傳統文人對「近代性」的經驗認識，這些攸關「近代化」歷程的問題，也在醫學史、文學史中展開探索。⁴⁴

都市空間中的大眾文化、消費文化、摩登「新女性」的登場等等，亦是圍繞著「殖民近代性」展開的研究主題。2000 年以後學院外亦出版不少相關主題的大眾史學作品。⁴⁵只是在這些作品中，九零年代以前受到忽視的「近代性」中的正面往往推至幕前，而過去強調的「殖民性」則退居幕後。這個現象一方面反映了讀者對「新鮮未知」的興趣；寫作者強調對過去認識的顛覆，但一方面也呈顯了學術研究與大眾史學之間焦點的差異。

與殖民近代性相關的其中一個研究取徑，則是著眼於傅柯的「作為規訓權力之近代」，用於考察殖民地社會的治理。諸如官方教育如何培養「順從的身體」；如何透過統計、調查等知識的累積，掌握土

⁴³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本統治下台湾の国語教育史再考》（東京：三元社，2001），中文版於 2006 年出版。

⁴⁴ 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變〉，《臺灣史研究》，8：1（臺北，2001），頁 41-88。范燕秋（1958-2021），《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臺灣醫學史》（板橋：稻鄉出版社，2005）。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2004）。

⁴⁵ 最具代表性的如：郭珍弟、簡偉斯導演、製作，《跳舞時代》（臺北：公共電視台，2003）。陳柔縉，《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麥田出版，2005）。

地與人民，進而改造都市空間，或對日常生活進行掌控與管理。⁴⁶不過，在同樣對社會領域的掌握、管理上，不同的研究取徑並存，也隨時間消長變化。例如，社會事業之研究，起初以窮民救助為主，論其在政策、制度面上的發展，是「有限的近代化」抑或「被抑制的近代化」，亦即將「近代」視為發展指標。⁴⁷近年來，相關研究則更望向不同性質的底層、邊緣的人群，如漢生病、盲人、鴉片吸食者、性工作者、浮浪者、不良少年等等，探討殖民政府如何透過調查、監控，區分正常與不正常的界線，將逸脫標準規範、具危險性質的人群隔離或排除，以治理殖民社會。⁴⁸這樣的研究取徑更傾向「作為規訓權力之近代」，也揭露「殖民近代性」中隱含的差序與歧視等隱性暴力的面向。

(二) 史料的搜集與研究視角的轉換：從官方到民間

史料的蒐集、整理，一直是史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基礎工作。關於臺灣史研究的史料蒐集整理工作，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主要在中國地方史研究的脈絡下展開，多著力於明清方志；口述對象則以重要家族和耆老為主。⁴⁹解嚴後，校園中的年輕研究者開始整理湮沒在大

46 如：姚人多，〈認識臺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2(臺北，2001)，頁119-182。謝仕淵，〈殖民統治與身體政治〉，收入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頁271-312。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清末至日治時期臺北空間權力模式的轉變〉(新店：左岸文化，2005)。

47 大友昌子，〈帝國日本の植民地社会事業政策研究——台湾、朝鮮〉(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

48 陳延媛主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底層社會——臺灣與朝鮮〉(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8)。

49 1950-1970年代的史料整理狀況，見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頁161-184。

學圖書館地下室中無人聞問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藏書，⁵⁰原被視為國家機密的總督府等官方檔案也陸續開放。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自 2000 年起，每兩年舉辦「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至 2020 年 8 月已邁入第十一屆。研究者透過難解的一手史料，重新檢討日本帝國的統治構造、官僚制度、各種政策的決策過程。而近二十年，一個明顯可見的動向是，相對於官方檔案，學術典藏單位更致力於各種民間史料的挖掘，這也帶動了新一波的研究以及視角的轉換。

中研院臺史所自籌備處時期便積極蒐集民間史料，特別是私人日記。1998 年成立日記解讀班，2000 年起陸續出版日記史料。⁵¹約當同一時期，中研院近史所、國史館、國立臺灣文學館等學術、典藏單位，亦出版日治時期的文人、知識分子、文學家的日記。這些日記作者橫跨臺灣人與日本人，男性與女性，不過，在社會階層上多屬地方上的有力人士、士紳階級、菁英，以及特定的家族；在性別上，女性微乎其微。能夠撰寫日記者，必定是具有讀寫能力的人，這使得日記史料在對象上有著極端的偏重，但這些史料的出現，讓過去必須大量仰賴日本殖民政府留下來的、具官方性質的資料進行研究的狀況，出現了很大的改變。研究者得以藉由日記進一步討論官方及民間日本人在政治、經濟上的相互關係；不同身份的臺灣人如何應對殖民統治。近年來，以日記史料為基底，也切入日常生活史、醫療史等不同面向的研究；同一部日記，也因研究者的關心不同，而呈現不同的剖面。

以學術單位的人力與資源，挖掘、蒐集、出版史料，相當程度地推動了研究的投入。中研院臺史所從 2000 年起便陸續舉辦多場日記

50 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頁 1-2。

51 關於臺灣日記史料的挖掘、解讀、出版到數位化之推展，以及研究上的現況與難點，可參見：許雪姬，〈「臺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2：1(臺北，2015)，頁 153-184。

相關研討會，2010 年以後更成為定期的研討會，至 2018 年為第七屆，並出版了兩本論文集。⁵²史料的挖掘，讓日記所見的各種人事物之探討成為可能，或將此前制度面的研究成果與日記所見的主體之行為相互參見，剖析政策與實態之間的落差、行動者之間更複雜多樣的關係。但另一方面，隨著日記中所見的新題材之開拓，個體的歷史如何在大的時空背景與社會脈絡中彰顯其意義，也成為新的挑戰。

除了日記史料之外，口述歷史的採集、出版也在研究機構的支持下持續進行，訪問對象的範圍也更為擴大，涵蓋日本時代新興行業的從業者、向中國或日本帝國勢力範圍移動的臺灣人，或特定空間下的不特定人群。⁵³相關議題的研討會也定期舉辦，並加入了日、韓研究者的討論。

除了上述學術、典藏單位之外，歷經多年籌備，2011 年正式開館營運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也致力於史料的復刻、出版，以及民間文物、影音等非文字資料的蒐集、修復。資料的典藏、公開，以及與研究者之間的協力，推進了影像、物質文化之研究；⁵⁴與教研單位的

⁵² 如：2000 年「日記資料與臺灣史研究——以田健治郎日記為中心」、2004 年「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2006 年紀念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日記與臺灣史研究」研討會。2010 年以後的主題包含了「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日記中的時代轉換」、「日記中的臺灣社會」等。參見：許雪姬，〈序二〉，收於許雪姬編，《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頁 iii-vii。

⁵³ 如：林玉茹、王泰升、曾品滄訪談，吳美慧、吳俊瑩記錄，《代書筆、商人風——百歲人瑞孫江淮先生訪問紀錄》（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8）。陳何著，劉士永主編，《陳何女士助產學筆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2017）。許雪姬、黃子寧等訪問，藍瑩如等紀錄，《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林玉茹訪問，林建廷紀錄，《雙城舊事——近代府城與臺北城市生活記憶口述歷史》（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8）。

⁵⁴ 如：羅欣怡主編，物質文化專題，《歷史臺灣》，7（臺南，2014）。三澤真

合作，則帶動了大眾史學的非虛構寫作。⁵⁵

不過要注意的是，口述採集與研究視角的轉換不限於學院內部，也有來自臺灣社會的脈動，進而刺激學院內研究視角的反思；對於民間史料、口述歷史的採集，亦不限於臺灣的研究典藏機構。

關於前者，1980年代初即已累積相當研究資料與成果的霧社事件之研究即為其代表。在1980年代中葉之後，學院外的研究者、漫畫家、小說家透過訪談、田野調查，在其書寫、創作中重新讓部落的「內部觀點」浮現；2000年以後，賽德克族人嘗試從傳統文化提出對霧社事件的詮釋，非菁英的餘生者更發出了他們的聲音，傳述部落中的歷史記憶。⁵⁶這些動向後續牽動了學院內的研究者重新面對「對原住民族而言的霧社事件」為何。⁵⁷換言之，解嚴前後的社會脈動及1980年代末期開始的原住民族運動，影響了1990年代中葉到2000年左右學院外對霧社事件書寫的視角變化；2000年以後，原住民部落及臺灣社會內部的民間力量，又進而刺激了學院內研究視角的重新思考。

關於後者，日本戰後歷史學在1970年代晚期重新檢討研究方法和對象的過程中，出現「民眾史研究」的動向，這是對於過去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下個人主體性日益稀薄的反思與批判，從而轉向關注「無

美惠編，《殖民地期台湾の映画——発見されたプロパガンダ・フィルム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7），本書的出版合作單位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⁵⁵ 蘇碩斌策劃，江昺崙、吳嘉泓等著，《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臺北：衛城出版，2017）。另外大眾史學的呈現，還包括台史博自身的刊物《觀·臺灣》。

⁵⁶ 詳見：周婉窈，〈試論戰後臺灣關於霧社事件的詮釋〉，《臺灣風物》，60：3（臺北，2010），頁11-57。

⁵⁷ 日本台湾学会「日本台湾学会報」編集委員会，特集「台湾原住民族についての霧社事件」，《日本台湾学会報》，12（東京，2010）。

名的個人」。⁵⁸各地方公民館開設講座，教授民眾撰寫「個人史(自分史)」，這也讓擁有戰爭、殖民地經驗的世代留下了自己的紀錄。⁵⁹與此同時，個別的研究者運用 1980 年代晚期接觸到的「ライフヒストリー(生活史/生命史)」，⁶⁰在解嚴後的臺灣採集個人史資料並進行研究。⁶¹2000 年以後更有一些研究者組成「臺灣口述歷史研究會(台湾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会)」，出版刊物分享調查成果。⁶²

綜上言之，日治臺灣史研究在 2000 年以後一個明顯的動向是致力於私文書、民間史料、口述歷史的採集、挖掘。日記、口訪、回憶錄等不同性質，但同為私文書的交錯運用，讓研究者得以更貼近制度下/制度縫隙中的個人抉擇，以及個人與國家、地方、社會互動的多重面向。這些動向與研究視角的轉換並行，也使「對原住民/殖民地人而言，霧社事件/殖民統治(或可以代換為帝國、終戰等等)為何」的反思充滿前進的可能。

58 長谷川貴彦、成田龍一、櫻井厚，〈座談會——個人史研究の現在、そしてエゴ・ドキュメントへ〉，《歴史評論》，777(東京，2015)，頁 6-32。

59 例如，竹中りつ子の《わが青春の台湾——女の戦中戦後史》(東京：図書出版社，1983)，便是參加「自分史」教室後的書寫作品。

60 「ライフヒストリー」在日文漢字中寫作「生活史」，不過在概念上與中文的「生命史」較接近，指個人一生的紀錄，或個人生活從過去到現在的紀錄，具體包含口述歷史、自傳、日記、傳記等等，而口訪是其中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參見：古富夫，《ライフ・ヒストリー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京都：世界思想社，1996)。

61 如，研究青年團的宮崎聖子於 1998~2003 年之間，在新莊、泰山等地進行個人生命史資料的採集，並於 2004 年提出博士論文。她自述當時採用的「ライフヒストリー」是文化人類學、社會學性質的研究方法之一，在日本的歷史學界還是異數。宮崎聖子，《殖民地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8。中文版出版於 2019 年。

62 出版不定期刊：台湾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会編，《台湾口述歴史研究》，1-19(東京，2009-2016)。

(三) 日本：帝國史研究的反思

隨著日本帝國史研究的發展，也出現了一些反思。駒込武在 1999 年度日本史研究大會的發言指出，日本帝國史的研究動向隱含了一個令人憂慮的陷阱——是否會成為「日本人」所做的、為了「日本人」的「朝鮮史」、「臺灣史」研究。他認為若欠缺「對朝鮮人或臺灣人而言，殖民統治具有的意義為何」之提問，或忽視研究再生產過程中的非對稱關係，很可能強化了「日本人」、「日本史」的框架，再生產殖民主義式的關係，而成為新的文化帝國主義。⁶³駒込提出的批判與反思，在日本學界引起了迴響，並刺激了後續的研究。

日本帝國史在 2000 年以後的另一趨勢，是關心與帝國擴張連結的學問、知識。岩波書店承續《近代日本與殖民地》，繼而推出《「帝國」日本的學知(「帝国」日本の学知)》系列，將近代日本的學問、知識，放在歷史的脈絡中探問其系譜——在日本邁向帝國的過程中，如何自歐美移入學問知識，如何在亞洲廣域的秩序中反芻，也以此重新省察今日所接受的理論、學問之樣態。⁶⁴

為了避免「帝國史研究」以克服「國別史」之名，行再生產殖民主義的思考框架之實，研究者們展開了漫長的嘗試。例如，岡本真希子為了避免過去政治史比較視野的空洞化，實證而細膩地考察臺灣與朝鮮龐大的殖民地官僚體系，梳理殖民地官僚的出身、任用與異動的實態。⁶⁵近藤正己等組成小研究團隊，透過一位地方官內海忠司留下

⁶³ 駒込武，〈コメント「帝国史」研究の射程〉，頁 224-231。

⁶⁴ 山本武利等編著，《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東京：岩波書店，2006）。

⁶⁵ 岡本真希子，《殖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台湾総督府と帝国日本》

的日記，立體而動態地掌握殖民地官僚的世界，描繪在臺日本人之間的社會網絡，以及在地方統治上，臺日人之間的協調、衝突、依存等多樣的互動關係。⁶⁶松田京子從「思想和實踐交錯的原住民統治」之觀點，解析日本帝國對於異文化表象的政治性與認識框架。⁶⁷

而後，(京都)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日文研)的共同研究，嘗試將視角轉向「地域社會」的居住者(朝鮮人、臺灣人、殖民地在住日本人等等)，探討其面對統治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反應，提出「帝國史與地域研究接軌」的可能性。⁶⁸橫跨臺日韓的研究者在《從地域社會所見的帝國日本與殖民地(地域社会から見る帝国日本と植民地)》中，處理殖民地統治權力與當地社會的關係、兩者之間產生的政治空間，並探問無法完全被殖民權力收納者的心性、底層社會的諸面向。順帶一提，臺灣的研究者也在《「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中嘗試從「臺灣」這個主體的在地觀點，呈現其與日本帝國交涉的多向關係。⁶⁹

回到駒込自身，他在回首《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一書時，認為自己的討論停留在日本史研究的框架內，一方面「批判日本人中心

(東京：三元社，2008)。中譯本出版於2019年。

⁶⁶ 內海忠司著，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帝國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2)。

⁶⁷ 松田京子，《帝国の視線——博覧会と異文化表象》(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松田京子，《帝国の思考——日本「帝国と台湾原住民」》(東京：有志舎，2014)。中譯本出版於2019年。

⁶⁸ 松田利彦、陳姪媛，〈序〉，收入松田利彦、陳姪媛編，《地域社会から見る帝国日本と植民地——朝鮮・台湾・満洲》(京都：思文閣出版，2013)，頁3-8。在這本書中的「地域社會」指隨著殖民統治的滲透或近代世界的形成而重整，自成一個完整的生活圈。

⁶⁹ 李承機、李育霖主編，《「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主義式的想法，但研究手法上卻充滿日本人中心主義式的態度」。⁷⁰在前述 2003 年《亞細亞遊學》特集中，他轉而考察圍繞著日本帝國內外部的西方人／西方(大英)帝國、以其為擋箭牌對抗殖民權力的被殖民者臺灣人、在意西方視線的日本殖民者，三者所形成的「三角關係」，以及在崎嶇小路中臺灣人菁英林茂生的軌跡，已可看到 2015 年新作的雛形。從日本史研究大會中的發言，到《亞細亞遊學》中的嘗試，顯示他嘗試貼近殖民地人民的視角，以克服過去研究的框架。在 2015 年的《世界史のなかの台湾植民地支配(中文版「臺灣人的學校之夢」)》中，駒込對於殖民統治的暴力性與主體性在歷史敘述上應如何統合的問題，在方法論上有著深刻的思考。他認為，若過於強調被殖民者的主體性，可能會忽視殖民統治的暴力性；若過於強調殖民統治的暴力性，則可能陷入了窄化被殖民者主體性的狹路，從而有必要剖析暴力的各種型態，並在這樣的相互關係中理解被殖民者的主體性。該書也是他自身對前作的反思以及此一提問的回應——在帝國史與世界史中貼近殖民地臺灣人主體性，並發現複數帝國之間的共犯結構，以及在此結構下的統治、被統治關係。⁷¹

《帝國日本的學知》出版後的影響也持續發酵。日文研的共同研究以比較視野考察殖民地大學，以實證的手法解析臺北帝大、京城帝大的創設、制度、學術思想的形成；學術知識扮演的機能、角色，以及其與戰後的關係。⁷²2010 年中葉以後，關於殖民統治與知識之間的

⁷⁰ 駒込武，〈中文版序〉，收入駒込武著，吳密察、許佩賢、林詩庭譯，《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頁 xi-xiv。

⁷¹ 駒込武，《世界史のなかの台湾植民地支配——台南長老教中学校からの視座》(東京：岩波書店，2015)。中文版出版於 2019 年。

⁷² 酒井哲哉、松田利彦編，《帝國日本と植民地大学》(東京：ゆまに書房，2014)。

關係，更進一步與前述的帝國史反思結合，已不同於早期的「日本帝國史」，而嘗試與在地社會的觀點結合。同樣是日文研橫跨台日韓的共同研究集結的《殖民地帝國日本的知與權力(植民地帝国日本における知と權力)》一書，聚焦於學問、知識與殖民統治之間的關係，並讓討論更多元細膩：不單單只是探討殖民統治者、官僚的「知」如何在政治經驗與殖民統治過程中形成，也關注被殖民者的知識、傳統的知識與帝國的「知」之間的關係，並探問這些不同性質的「知」如何左右殖民統治的樣態。⁷³

(四) 既有課題的深化、重探與新的動向

如同前述，對「殖民近代性」的探問是 2000 年以後研究成果的特色之一，但並非所有的問題意識皆出自於此，也有不少的研究，是對 1990 年代以來開拓的研究主題持續的深化，或因史料的挖掘而進行重探。在這過程中，一方面交織了「殖民近代性」、比較視野等同時代研究動向的影響，一方面更致力於內在問題的克服與突破。

以傳統殖民政策、經濟史的領域而言，研究者持續挑戰矢內原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論觀點之分析方式。⁷⁴此外，一些研究也探究政策推行過程中面臨的各種矛盾與調整過程，嘗試跳脫「掠奪、反

⁷³ 松田利彦、陳姪媛編，《殖民地帝國日本における知と權力》(京都：思文閣出版，2019)。

⁷⁴ 林文凱曾詳細討論 2000 年以後工業史研究觀點的更新——從殖民近代化論觀點對過去帝國主義論研究傳統的修正；此外，近年研究也對戰後前輩學者強調殖民遺留的負面政經結構提出論辯，主張戰前戰後經濟發展的延續性。詳見：林文凱，〈晚近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史研究的進展——從帝國主義論到殖民近代化論的轉變〉，《臺灣文獻》，68：4(南投，2017)，頁 117-146。

抗」的單一視角。以林野政策為例，更進一步考慮舊慣新規之轉換接續、近代的知識體系、市場價值、山林保育觀、行動者間的互動關係等多重的因素，並注重主體、客體、空間、時期所帶來的差異。而研究的觸角更從傳統的政治、經濟史跨向環境史等新領域。⁷⁵以政治史的範疇而言，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政治運動、文化運動、社會運動，此前多以官方中國民族主義的視角考察與中國之間的連結關係；「抵抗」是基於對「祖國」中國的民族認同。2000年以後，認同本身的內涵重新被探問；臺灣民族主義是否萌芽成為探究的問題；運動的連結不限於中國，而更注重東亞知識份子之間的交流與結盟。⁷⁶而過去在反共時代下無論史料或視野皆受限的農民運動、工運、臺灣共產黨等左翼運動史，也有了進一步的研究進展。⁷⁷除此之外，關乎殖民

⁷⁵ 如：李文良，〈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洪廣冀，〈林學、資本主義與邊區統治——日治時期林野調查與整理事業的再思考〉，《臺灣史研究》，11：2（臺北，2004），頁77-144。洪廣冀，〈從「臺灣之恥」到「發展最速的產業」——再思日治時期臺灣的科學林業與工業化〉，《臺灣史研究》，25：3，（臺北，2018），頁83-140。

⁷⁶ Rwei-Ren Wu, "The Formosan Ideology." 其中部分章節改寫發表於《新史學》。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〇-一九五〇〉（臺北：曹永和文教基金會，2008）。紀旭峰，〈大正期台湾人の日本留学研究〉（東京：龍溪書舍，2012）。

⁷⁷ 陳慈玉主編，〈地方菁英與臺灣農民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蔡石山編著，〈滄桑十年——簡吉與臺灣農民運動1924-1934〉（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2）。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臺北：海峽學術，2009）。2000年以前，關於左翼運動，重要的研究有：盧修一，〈日據時代臺灣共產黨史(1928-1932)〉（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臺北：麥田出版，1998）。史料與視野受限的狀態，詳見：陳芳明，〈左翼史的解密與解謎——序《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收於郭杰、白安娜原著，李隨安、陳進盛譯，許雪姬、鍾淑敏主編，〈臺

統治「協力」或「抵抗」的世代，嘗試從「青年」與「地域社會」的社會史角度探問其各種類型；向來被放在政治運動脈絡下討論的《臺灣民報》，也出現探向出版、媒體環境等文化史取徑的研究。⁷⁸

在 90 年代才進入研究視野的臺籍日本兵、戰爭動員等議題，近年持續有研究者投入。除了過去所著重的總體戰下人力、人心的組織動員之外，也不乏考察官方在戰時體制下橫跨政治、文化、經濟等各層面的統制。其中，不同於過去強調「被動員」的角色，也注意到被動員者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例如，曾品滄以黑市為例，嘗試勾勒臺灣人在戰線後方憑藉在地化的優勢掌握糧食資源，以及戰爭帶來的一體化、另類臺日同化。⁷⁹隨著口述歷史的推展、日記的挖掘等，戰爭下的生活也更立體而血肉地呈現。如從性別的角度出發，探問女性如何參與戰爭、戰時下的娛樂、躲空襲、疏開等日常生活；職場的變化、謀生的選擇；個人命運如何因戰爭受擺佈沈淪，或協力、共感，以及臺、日人經驗的差異與複雜的心境等。⁸⁰

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頁 vii-xi。

78 陳文松，《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莊勝全，〈《臺灣民報》的生命史——日治時期臺灣媒體的報導、出版與流通〉(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

79 曾品滄，〈餐桌上的戰爭——日治末期臺灣的食物配給、黑市與殖民地社會〉，《新史學》，28：4(臺北，2017)，頁 1-48。

80 游鑑明著，大澤肇譯，〈受益者か、それとも被害者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の台湾人女性(1937-1945)〉，收於早川紀代編，《植民地と戦争責任》(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頁 78-100。曾士榮，〈戰爭動員、日常生活與臺灣女性——以《阮木筆日記》為中心〉，收入陳芳明、吳佩珍編，《東亞文學的實像與虛像》(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頁 169-193。洪郁如，〈戰爭記憶與殖民地經驗——開原綠的臺灣日記〉，《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4(臺北，2014)，頁 48-82。

儘管許多主題的研究在時間軸線上都會論及該議題在進入戰爭時期後的變化，不過，以戰時體制為考察對象，在相關議題上呈現長足進展的是戰時下文化現象的探討。例如，《臺灣的「大東亞戰爭」(台湾の「大東亜戦争」)》，執筆者橫跨臺日，討論戰爭時期的官方文化政策，以及在時局限制下文學家、文藝團體的活動。⁸¹2008年《帝國裡的「地方文化」》，同樣以文學、戲劇等文化活動為考察對象，但更聚焦在1940年以後，翼贊文化運動路線下文化政策的調整，嘗試分析官制地方文化與本土地方文化，兩種不同的論述、思維與行動。換言之，基於此時對皇民化運動的重新審視——該運動存在前後期的變化與差異，⁸²除了考察官方政策的推動之外，更著眼於臺灣作為「帝國下的一個地方主體」，如何運用有限的空間重新想像自身的位置。⁸³順帶一提，這兩部論文集皆與90年代晚期以來學術社群的成立、研究者之間的交流密切相關。前者是日本臺灣學會成員們在學術大會後持續合作交流的結晶；後者的執筆者與「日臺青年臺灣史研究者交流會議」參加者有很大的重疊性。

上述從經濟史到政治史，社會史到文化史的新研究成果，也都讓我們窺見在殖民統治、資本主義化或戰爭動員下看似鋪天蓋地的態勢中，被統治者仍有其對應、交涉、挪用等多樣的身姿。

另一方面，1990年代以來，當臺灣史研究跳脫中國地方史的一環，日本史也嘗試超越「國別史」而興起日本帝國史研究，在這兩個動向

81 藤井省三、黃英哲、垂水千惠編，《台湾の「大東亜戦争」——文学・メディア・文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

82 蔡錦堂，〈再論「皇民化運動」〉，《淡江史學》，18(淡水，2007)，頁227-245。

83 吳密察策劃，石婉舜、柳書琴、許佩賢編，《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臺北：播種者文化，2008)。

交錯下，在複數殖民地間移動，多重邊緣、夾縫中的人群，也成為研究的焦點。

1980年代晚期到1990年代初，梁華璜考察旅券制度與臺灣籍民在福建的活動，可謂此一主題的先聲，但研究的關心出自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⁸⁴2000年以後，研究者們從不同的座標，追探臺灣人在中國、日本，以及各殖民地之間的跨境與活動。⁸⁵在與政治史、經濟史的接續關係上，探問在複數帝國競爭下，隨資本企業移動的臺灣人之軌跡；在國際關係史的延長線上，考察跨越國界的移動與國籍問題；在文藝與政治的交界處，追探在「帝國」日本下受限的電影製作，以及前往「祖國」中國追求自我表現場域的電影人，其在複雜政治角力下的活動足跡。⁸⁶這些研究往往觸及過去被國家疆界排除、遺忘的人群，且不同於過往民族主義的評判標準，或僅專注於「被壓迫」的面向，而更嘗試理解人們在時空下可能的選擇。同時，貼近人們在

84 梁華璜，〈日據時代台民赴華之旅券制度〉，收入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板橋：稻鄉出版社，2001），頁131-182。此篇原本在1988年發表於成功大學《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論文集》第1號。梁華璜，〈日據時代臺灣籍民在閩省的活動及處境〉，收入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研究》，頁183-213，此篇原在1993年發表於《近代日本と殖民地》第5卷。

85 如：陳姪媛，〈放眼帝國、伺機而動——在朝鮮學醫的臺灣人〉，《臺灣史研究》，19：1（臺北，2012），頁87-140。許雪姬，〈在「滿洲國」的臺灣人高等官——以大同學院的畢業生為例〉，《臺灣史研究》19：3（臺北，2012），頁95-150。

86 王泰升、阿部由理香、吳俊瑩，《臺灣人的國籍初體驗——日治臺灣與中國跨界人的移動及其法律生活》（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5）。鍾淑敏，〈戰前臺灣人英屬北婆羅洲移民史〉，《臺灣史研究》，22：1（臺北，2015），頁25-80。三澤真美惠，《「帝国」と「祖国」のはざま——植民地期台湾映画人の交渉と越境》（東京：岩波書店，2010）。此書中文版出版於2012年。

帝國結構下的協力、獲取利益，或運用帝國開啟機會，尋找自我發揮的可能性，以及從中所見的日本帝國圖像。

至於臺灣人以外的移動者，1990年出版專書的又吉盛清，追探在臺沖繩人的足跡，指出同為「內地人」的沖繩人，作為殖民統治的尖兵，卻同時遭受歧視、差別待遇，內心存在矛盾糾葛的樣態。⁸⁷來自日本帝國「邊陲」的視野，開啟了後續對日本帝國的兩個邊陲——臺灣與沖繩的關係及其間人的移動之關注。後繼研究者解析沖繩人在被日本併吞、逐漸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向臺灣移動、謀生的實態與處境，同時，指出從日本輸入臺灣的「近代性」繞道回流至沖繩的現象。⁸⁸這些研究反射出帝國空間中人同為「日本人」、「統治者」內部的異質性與關係的多樣性，關於殖民地經驗，也呈現較「殖民近代性」更複雜的樣貌。

與此相關的殖民地日本人社群，1990年代晚期日本研究者考察日本經濟團體、企業在亞洲的擴張。⁸⁹2000年以後，臺灣的研究者也聚焦在臺灣的日本企業、財團、商業團體如何以殖民地為據點展開活動，及其在統治構造中展開的政商關係。一些研究在問題意識上，除了延續經濟史傳統，更加入了區域性的視角，特別是對東臺灣的關心；研究範圍涵蓋大資本、大企業、國策會社，以及在帝國底邊支撐日本向外擴張的農漁民；討論內容更深化至殖民統治過程中的摸索狀況、技

87 又吉盛清，《日本植民地下の台湾と沖縄》（沖縄：沖縄あき書房，1990），此書中文版出版於1997年。

88 朱惠足，〈作為交界場域的「現代性」——往返於沖繩八重山群島與殖民地臺灣之間〉，《文化研究》，5（新竹，2007），頁49-86。Hiroko Matsuda（松田ヒロコ），*Liminality of the Japanese Empire: Border Crossings from Okinawa to Colonial Taiwan*（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8）。

89 波形昭一編著，《近代アジアの日本人経済団体》（東京：同文館出版，1997）。

術的移植、近代化的跛足性等。⁹⁰除了經濟史的取徑之外，研究者也將目光投向相對於邊區東部，不同於國家推動的政策移民，以社會文化史的取徑描繪大量聚居都市的日本人，探問其時代心理及「內地式」生活文化的移植與變貌。⁹¹

1990年代以來逐漸展露頭角的社會史、文化史、女性史等研究，也持續深化並開拓。洪郁如以「新女性」的誕生為主軸，觀察殖民地社會構造的變動，包含臺灣人家族在政權交替下的戰略與因應，以及女性因就學而展開的身體、家庭、社會關係之變化。⁹²近年，她更留意到對於日本時代經驗的敘述與發聲，因階層差異而產生極度不均的現象，從而透過片斷的資料線索與口述採集，致力理解那些相對於上層社會的「非識字者」、農漁村的女性，描繪其殖民統治的經驗與自我培力的過程。⁹³另一方面，在帝國史與女性史接壤地帶，也出現了

90 鍾淑敏，〈政商與日治時期東臺灣的開發——以賀田金三郎為中心的考察〉，《臺灣史研究》，11：1（臺北，2004），頁79-117。趙祐志，〈日人在台企業精英的社會網絡（1895-1945）〉（臺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5）。林玉茹，〈殖民與產業改造——日治時期東臺灣的官營漁業移民〉，《臺灣史研究》，7：2（臺北，2001），頁51-93。林玉茹，〈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臺北：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林玉茹，〈殖民地的產業治理與摸索——明治末年臺灣的官營日本人漁業移民〉，《新史學》，24：3（臺北，2013），頁95-133。

91 顏杏如，〈殖民地都市台北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生活文化——「空間」と「時間」における移植、変容〉（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論文，2009）。

92 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本の殖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東京：勁草書房，2001）。此書中文版出版於2017年。

93 洪郁如，〈読み書きと殖民地——台湾の識字問題〉，《言語文化》，49（国立，2012），頁75-93。洪郁如，〈もう一つの「日本時代」——近現代台湾女性の識字とエンパワーメント〉，《中国語中国文化》，16（東京，

一些研究注意到相對於上層階級，中間層日本女性在帝國擴張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底層的朝鮮娼婦在日本帝國與殖民地夾縫中流動跨界的樣態與處境。⁹⁴

關於臺灣社會本身的變遷，不少研究者注意到日治時期觀光、休閒活動的大量出現，揭示其為時代中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進而考察觀光休閒活動在制度、物理性的空間，以及身體感官上與前近代的差異。⁹⁵其中，呂紹理探討博覽會——對帝國而言的展示活動，對民眾而言的休閒娛樂活動，在不同行動者(統治者、參展者、觀眾)間產生的意義；空間中流動的符號意涵與近代權力規訓的施展，以及「近代性」的龐大表徵：知識分類架構、帝國主義與消費社會的結合。⁹⁶此一考察雖然不源自前述「殖民近代性」的質問，但同樣揭示了近代性與殖民性的糾葛，同時貼近民眾的角度，探究空間與娛樂的關係。此外，收音機廣播、通俗雜誌、流行歌的出現等，象徵了 1930 年代都市文化與大眾文化的興起，研究者分析其與殖民主義、資本主義之間的角力、妥協；本土文化的形成，乃至戰後的再製。⁹⁷同樣聚焦於 1930 年

2019)，頁 31-46。

⁹⁴ 顏杏如〈與帝國的脚步俱進——高橋鏡子的跨界、外地經驗與國家意識〉，《臺大歷史學報》，52(臺北，2013)，頁 251-302。陳姪媛，〈在殖民地臺灣社會夾縫中的朝鮮人娼妓業〉，《臺灣史研究》，17：3(臺北，2010)，頁 107-149。

⁹⁵ 如：曾山毅，《殖民地台灣と近代ツーリズム》(東京：青弓社，2003)。蘇碩斌，〈觀光 / 被觀光——日治臺灣旅遊活動的社會學考察〉，《臺灣社會學刊》，36(高雄，2006)，頁 167-209。徐聖凱，〈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共休閒與休閒近代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9)。

⁹⁶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2005)。

⁹⁷ 李承機，〈ラジオ放送と植民地台湾の大衆文化〉，收入貴志俊彦、川島

代，延續被殖民者「心靈」、身體規訓、「同化」等議題的討論，教育史研究運用新開放的日記、口述、地方性質的檔案，從殖民政府的推運動員和臺灣民眾的想望之雙向角度切入，探討尚未進入皇民化時期的學校／國語教育在地方上的樣態；也嘗試將視野下降至個人，剖析在結構的限制下，地方青年教師在職涯上的選擇。⁹⁸

上述無論是關於人群的移動，或女性史、社會文化史的研究，都不難看到研究視角的變化——除了特定的階層、群體(如農漁民、中產階級)的歷史之外，也逐漸將視角延伸至(未必知名的)個人，以微觀的生命史折射特定的歷史現象或社會結構。另一方面，關於社會變遷的探討，1980年代以來，不乏1920年代政治社會文化運動的研究，1990年代之後，1930年代後期的皇民化運動、戰爭經驗受到關注，然而介於兩者之間的1920年代晚期到1930年代中期之前的社會文化現象，多集中在都會文化、大眾文化的興起，然對此一時期與前後兩時期的承續、轉折關係之認識與討論仍有限，恰形成了交界待探索的地帶。

與社會文化史相關的另一個重要動向是關於「知識」形成過程的重探。日治時期留下大量的調查資料，讓臺日研究者自1990年代初起就注意到這些從事調查的人物及其留下來的紀錄。不過起初的研究多著重於調查與統治之間的關係，或將之視為臺灣研究的開端，或

真、孫安石編，《戰爭・ラジオ・記憶》(東京：勉誠，2006)，頁133-155。

柳書琴，〈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1930年代臺灣的讀書市場〉，《中外文學》33：7(臺北，2004)，頁19-55。陳培豐，〈從三種演歌來看重層殖民下的臺灣圖像——重組「類似」凸顯「差異」再創自我〉，《臺灣史研究》，15：2(臺北，2008)，頁79-133。

⁹⁸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1930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新北：衛城出版，2015)。藤森智子，《日本統治下台湾の「国語」普及運動——国語講習所の成立とその影響》(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社，2016)。

整理調查機構的制度、組織的建立變遷等。⁹⁹而後，知識本身內在的變化及其形成的過程日益受到重視，同時也探向其與產業發展、物本身的時空意義、與生態環境之連結等面向。¹⁰⁰其中，醫學史研究解析疾病的社會文化意義，考察特定的概念如何在殖民脈絡中形成，反映集體的處境與心態；交錯的社會、政治權力如何形塑患者的身分。¹⁰¹而陳偉智更以集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等等多重身份的伊能嘉矩為考察對象，重新探問其知識的生產過程，如何在殖民情境下擔保的知識網絡中誕生；與同時代主流知識理論之間的關係，並進一步追查戰後這些知識如何被挪用與再現，影響今日的認識。¹⁰²

另一方面，在社會文化史中也開展出多樣的議題，如飲食活動與認同、文化展演；全球化跨境流動下對臺灣飲食文化產生的影響；動物在國家、社會與個人生活中的角色等等。¹⁰³若參照每一、二年舉辦

99 如：吳文星，〈東京帝國大學與臺灣「學術探險」之展開〉，收入黃富三等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頁 23-40。鄭政誠，《臺灣大調查——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蘆洲：博揚文化，2005）。

100 如：顧雅文，〈日治時期臺灣的金雞納樹栽培與奎寧製藥〉，《臺灣史研究》，18：3（臺北，2011），頁 47-91。呂紹理，〈從螟蛉到螟害——近代臺灣的農業蟲害及其防治〉，《臺大歷史學報》，56（臺北，2015），頁 133-188。顧雅文，〈1930-1960 年金雞納與奎寧在臺生命史——時空特徵與意義轉化〉，《新史學》，27：3（臺北，2016），頁 177-226。吳永華，〈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101 巫毓荃，〈「病態」的民族——日治晚期臺灣的民族性精神疾病史〉（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其中部分章節改寫後陸續發表於《女學學誌》、《新史學》等期刊。范燕秋，〈癩病療養所與患者身分的建構——日治時代臺灣的癩病社會史〉，《臺灣史研究》，15：4（臺北，2008），頁 87-120。

102 陳偉智，《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103 陳玉箴，〈食物消費中的國家、階級與文化展演——日治與戰後初期的「臺

的「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不難發現研究領域發展的軌跡——從政治史、經濟史，轉向社會史、文化史，並逐漸細分化，發展出環境史、動物史等等的新領域。¹⁰⁴

綜觀 2000 年以後的研究動向，無論臺灣或日本學界，相對於過去著眼於物理性的、明確可見的經濟的、政治的收奪和壓制，皆開始探討那些潛藏的、未必明顯可見的殖民統治技術，及其帶來的更幽微不顯的、滲透至生活中的國家權力、規訓與知識霸權。在研究視角上從官方的政策制度轉向在地社會的對應與思維，以及不同歷史行動者之間多重的糾葛與往復關係，並重探知識之生成脈絡，及其與治理性之關聯。在研究領域上，有著從經濟史、政治史到社會史、文化史的發展軌跡，近年更開展出環境史、動物史等更專門、分化的領域。這也意味了除了關注傳統經濟政治上的殖民統治之外，更進而思索在此一特定時空結構下，人與社會，人與物、環境、知識、情報等等方方面面的多重交互作用。

灣菜」》，《臺灣史研究》15：3（臺北，2008），頁 139-186。曾品滄，〈日治時期臺灣菜譜的演進與東亞食文化的跨境流動〉，《臺灣史研究》，25：3（臺北，2018），頁 43-82。鄭麗榕，〈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以臺北圓山動物園為主的探討〉（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3），後出版為《文明的野獸——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新北：遠足文化，2020）。張素玢，〈移民與山豬的戰爭——國家政策對生態的影響（1910-1930）〉，《師大臺灣史學報》，4（臺北，2011），頁 95-127。

¹⁰⁴ 2008 年的議程中，佔回顧中最大宗的為「政治史」、「經濟史」，2010 年以後才出現的「區域史」、「教育史」、「體育休閒史」、「醫療衛生史」、「宗教史」、「族群史」、「美術史」、「文學史」等等，這些在 2008 年只屬於「議題」類，而未成為「XX 史」的分類領域。2016 年則出現「大眾生活史」、「農業史」、「工業史」、「環境史」、「社會文化史到全球史」等報告主題，政治史只有「戰後政治史」，2018 年則有「近代政治史」、「文學史」、「宗教史」、「教育史」、「動物史」、「林野及林業」、「博物學」、「森林學」、「經濟史」、「原住民族史」等。

四、反思與前瞻

美國學者莎拉·瑪札(Sarah Maza)在《想想歷史》中，以「誰的歷史」、「何處的歷史」、「什麼的歷史」回顧過去近半世紀，西方研究者如何面對此前史學研究成果產生的問題，並思考如何克服這些問題，及其為研究方法和書寫上帶來的轉變。¹⁰⁵如果我們借用「誰的歷史」、「何處的歷史」、「什麼的歷史」這幾個切入點，重新整理 1980 年代晚期至今日治臺灣史研究的發展，可以看到以下的轉變與動向，及其尚待克服的問題。

以「何處的歷史」而言，日治臺灣史從 1980 年代以前中國地方史下的空白，到 1990 年代之後在強調世界史、地域史、與周邊關係的脈絡中登場。在此時期，世界史、日本史研究意欲打破國別史、民族國家界線；臺灣史研究則一邊跳脫中國史框架，描繪其與周邊地域之間的互動，一邊掙脫戰後官方中國民族主義的束縛，映照出臺灣自身的輪廓。隨著後續研究的展開，人、物的流動跨界，明確的疆域界線再次被打破。而當研究的視野擴及與周邊關係的互動時，中國與日本兩個巨大的磁場，各帝國之間的共犯結構、殖民地之間的交流往復，都再次重塑日治臺灣史的內涵。

當「何處的歷史」以連續性的觀點看島嶼上人群的來去與活動，原本被排除在官方歷史敘述之外的人群、因政權變動在疆界內外移動的人群，也得以納入研究的對象與視野。「誰的歷史」，不再限於「今日」島嶼上的漢人、原住民族，還包含了「過去」曾在島嶼上活動的多樣人群——殖民者日本人、帝國邊陲的沖繩人、同屬帝國體系的西

¹⁰⁵ 莎拉·瑪札(Sarah Maza)著，陳建元譯，《想想歷史(Thinking About History)》(臺北：時報文化，2018)。

方人、貿易往來兩岸的清人、中國人，同為殖民地人的朝鮮人等等多樣的歷史主體與行動者，以及彼此之間的交互關係。而研究的視角則從政策制定者的重要人物，轉向無名大眾，在特定經驗、階層等整體的歷史之外，也將視線聚焦在特定的個人，從微小的個體生命望向其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結構。同時，更關注被統治者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以及帝國夾縫中的人群，社會底層邊緣的人。透過研究也揭露在(大英、日本)帝國內部、殖民地社會內部、複數殖民地之間，人群因地域出身、社會階層、性別等差異產生的各種「重層性」。

但另一方面，這些因跨域，或個體生命與時代交錯而得以凸顯的人群的多樣性，是否得以讓我們回頭再次審視臺灣人與臺灣社會內部的「重層性」？過去研究者注意到的人群差異多為：政治社會運動中的左翼、右翼的路線差異；在統治政策上漢人、原住民社會的制度差異；在被殖民經驗上的世代差異。隨著日記等個人史料的挖掘，以及口述歷史的展開，研究者得以反轉視線探問人的主體性與能動性，但得以留下日記者仍多為上層社會的臺灣人、知識份子，口述的展開仍傾向擁有特定經驗的人群。面對這些困境，如同前述已有研究者進而探問非識字者、農漁村的經驗。隨著前行研究的開路，未來我們或可再進一步探問性別的、階層的、地域性的、城鄉都鄙、職業身份、甚至是移動經驗所帶來的，面對殖民統治、殖民近代性、戰時體制等諸多課題的經驗差異，及人群在其中所顯現的重層性。

「什麼的歷史」則隨著「誰的歷史」視角的轉換——從統治者探向被統治者的主體性，研究的關心已逐漸從 1980 年代以來對政策制定、統治原理的考察，轉向探問被統治者面對統治的多樣對應方式，近年更投向一般大眾的日常生活、物質文化。研究的重點，從殖民統治在經濟、政治上顯而可見的收奪、壓迫，轉向隱微不顯，卻以各種媒介滲透的知識、權力關係；攸關統治的調查、學術研究的知識本身；

知識生產的過程如何在殖民情境、全球與在地的脈絡中成形，成為再探的課題。此外，動物史、環境史在近幾年也逐漸發展，成為新鮮的領域。

隨著史料的發現、挖掘，研究視角的翻轉，帶來了議題的多樣化與豐富化，但另一方面，一些研究主題也往往變得孤立而瑣碎化。在不同的時代，研究者有著不同的挑戰，從民族主義、二元對立史觀的掙脫，到今日強調多元主體、多向往復關係的內涵，卻也產生一些向外發散、變得零碎的狀況。思考各議題所具有的意義，與大的時代脈絡結合、議題與議題之間的相互對話，是今日研究者無可迴避的課題。此外，隨著官方中國民族主義與二元對立史觀的跳脫，研究者不斷挖掘新鮮、未知的議題，但相對地，傳統而經典的議題卻少有人以新的觀點重探，比較的視野也鮮少回到這些傳統的議題。帶著自我警惕的心情，期待這些傳統課題以新的眼光、視角重新被探索。

在研究社群上，跨國的合作與對話、青年學者的交流仍持續。如政治大學和日本東京大學、一橋大學等共同主辦的「臺灣史青年學者學術研討會」，自 2008 年起舉辦第一屆，2016 年起更名為「臺灣與東亞近代史青年學者學術研討會」，至今已邁入第十二年，並出版研究論集，是年輕研究者對話、交流的場域。¹⁰⁶學術單位舉辦特定議題的研討會，也持續提供殖民地研究的比較視野。從 1990 年代晚期以來累積的跨國研究對話與刺激，其重要的影響是：外國的學者越來越重視臺灣人「在地」的脈絡與主體性，臺灣的學者越來越重視比較、

¹⁰⁶ 若林正丈、松永正義、薛化元主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論集》（板橋：稻鄉出版社，2008）。此系列至 2013 共出了五集，每集編者不同。薛化元、川島真、洪郁如主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與東亞近代史研究論集》（新北：稻鄉出版社，2016）。此系列目前出版至 2020 年的第四輯，每輯編者不同。

跨域的視野。不過目前較多的比較、跨域的研討會發表，仍傾向針對各自的研究主題進行，期待日後這些交流能夠進一步地轉化，成為藉以論證日治臺灣史特色的視野與資材。

(本文於 2020 年 8 月 10 日收稿；2021 年 2 月 4 日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發表於「學術社群、知識生產與歷史書寫——《新史學》三十週年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9 年 11 月 30 日)。由衷感謝當日與會師友及《新史學》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陳偉智教授閱讀初稿給予建議並修訂英文摘要，記之以表謝意。謹以此文向台灣史研究的所有前行者致敬，並期與同行者一同思索並開拓未來。

徵引書目

一、近人論著

- 〈發刊詞〉，《新史學》，1：1(臺北，1990)，頁 1-4。
- 《アジア遊学》編集部，〈特集〉台湾——模索中の躍動，《アジア遊学》，48(東京，2003)。
- 《臺灣史研究》編輯組，〈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1：1(臺北，1994)，頁 13-23。
- 又吉盛清，《日本植民地下の台湾と沖縄》，沖縄：沖縄あき書房，1990。
- 三澤真美恵，《「帝国」と「祖国」のはざま——植民地期台湾映画人の交渉と越境》東京：岩波書店，2010。
- 三澤真美恵編，《植民地期台湾の映画——発見されたプロパガンダ・フィルム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7。
- 大友昌子，《帝国日本の植民地社会事業政策研究——台湾、朝鮮》，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
- 大江志乃夫等編，《岩波講座 近代日本と植民地》(全八卷)，東京：岩波書店，1992-1993。
- 小熊英二，《〈日本人〉の境界——沖縄、アイヌ、台湾、朝鮮植民地支配から復帰運動まで》，東京：新曜社，1998。
- 山本武利等編著，《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全八卷)，東京：岩波書店，2006。
- 内海忠司著，近藤正己、北村嘉恵、駒込武編，《内海忠司日記 1928-1939——帝国日本の官僚と植民地台湾》，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2。
- 日本台湾学会『日本台湾学会報』編集委員会，《日本台湾学会報》，11(東京，2009)。
- 日本台湾学会『日本台湾学会報』編集委員会，《日本台湾学会報》，21(千葉，2019)。
- 日本台湾学会「日本台湾学会報」編集委員会，特集「台湾原住民族にとっての霧社事件」，《日本台湾学会報》，12(東京，2010)。
- 日本植民地研究会編，《日本植民地研究の現状と課題》，東京：アテネ社，2008。
- 王泰升，《臺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
- 王泰升、阿部由理香、吳俊瑩，《臺灣人的國籍初體驗——日治臺灣與中國跨界人的移

- 動及其法律生活》，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5。
- 加藤邦彦，《一視同仁の果て——台湾人元軍属の境遇》，東京：勁草書房，1979。
- 古富夫，《ライフ・ヒストリー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京都：世界思想社，1996。
- 台灣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会編，《台灣口述歷史研究》，1-19(東京，2009-2016)。
- 台灣近現代史研究会編，《台灣近現代史研究》，1-6(東京，1978-1988)。
- 外村大，〈戰後日本における朝鮮植民地支配の歴史認識〉，《神奈川大学評論》，81(神奈川，2015)，頁 83-90。
- 向山寛夫，《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民族運動史》，東京：東京中央經濟研究所，1987。
- 朱惠足，〈作為交界場域的『現代性』——往返於沖繩八重山群島與殖民地臺灣之間〉，《文化研究》，5(新竹，2007)，頁 49-86。
- 竹中りつ子，《わが青春の台湾——女の戦中戦後史》，東京：図書出版社，1983。
- 吳文星，〈東京帝國大學與臺灣「學術探險」之展開〉，收入黃富三等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 23-40。
- 吳永華，《早田文藏——臺灣植物大命名時代》，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 吳密察，〈台灣史の成立とその課題〉，收於溝口雄三等編，《周縁からの歴史》，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4，頁 219-242。
- 吳密察策劃，石婉舜、柳書琴、許佩賢編，《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臺灣文化狀況》，臺北：播種者文化，2008。
- 呂紹理，〈從螟蛉到螟害——近代臺灣的農業蟲害及其防治〉，《臺大歷史學報》，56(臺北，2015)，頁 133-188。
-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8。
-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2005。
- 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臺北：銀華出版部，1961。
- 巫毓莖，〈「病態」的民族——日治晚期臺灣的民族性精神疾病史〉，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 李文良，〈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 李承機，〈ラジオ放送と植民地台湾の大衆文化〉，收入貴志俊彦、川島真、孫安石編，《戦争・ラジオ・記憶》東京：勉誠，2006，頁 133-155。

-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2004。
- 李承機、李育霖主編，〈「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 周婉窋，〈日本在臺軍事動員與臺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1937-1945)〉，《臺灣史研究》，2：1(臺北，1995)，頁 85-125。
- 周婉窋，〈試論戰後臺灣關於霧社事件的詮釋〉，《臺灣風物》，60：3(臺北，2010)，頁 11-57。
- 周婉窋，〈日據時代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
- 周婉窋，〈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3。
- 岡本真希子，〈在台灣「內地」人の「民権」論——植民地在住者の政治参加の一側面〉，《日本史攷究》，25(東京，1999)，頁 30-52。
- 岡本真希子，〈植民地台灣に関する近年の研究動向〉，《日本植民地研究》，16(東京，2004)，頁 46-53。
- 岡本真希子，〈植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台灣總督府と帝国日本〉，東京：三元社，2008。
- 岸本美緒，〈アジアからの諸視角——「交錯」と「対話」〉，《歴史学研究》，676(東京，1995)，頁 36-47。
- 松田京子，〈帝国の視線——博覧会と異文化表象〉，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
- 松田京子，〈帝国の思考——日本「帝国と台湾原住民」〉，東京：有志舎，2014。
- 松田利彦、陳延湊編，〈地域社会から見る帝国日本と植民地——朝鮮・台湾・満洲〉，京都：思文閣出版，2013。
- 松田利彦、陳延湊編，〈植民地帝国日本における知と権力〉，京都：思文閣出版，2019。
- 林文凱，〈晚近日治時期臺灣工業史研究的進展——從帝國主義論到殖民近代化論的轉變〉，《臺灣文獻》，68：4(南投，2017)，頁 117-146。
- 林玉茹，〈殖民地的產業治理與摸索——明治末年臺灣的官營日本人漁業移民〉，《新史學》，24：3(臺北，2013)，頁 95-133。
- 林玉茹，〈殖民與產業改造——日治時期東臺灣的官營漁業移民〉，《臺灣史研究》，7：2(臺北，2001)，頁 51-93。
- 林玉茹，〈國策會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經營〉，

- 臺北：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2011。
- 林玉茹、王泰升、曾品滄訪談，吳美慧、吳俊瑩記錄，《代書筆、商人風——百歲人瑞孫江淮先生訪問紀錄》，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8。
- 林玉茹訪問，林建廷紀錄，《雙城舊事——近代府城與臺北城市生活記憶口述歷史》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8。
- 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係之研究》，板橋：稻鄉出版社，1996。
- 波形昭一編著，《近代アジアの日本人経済団体》，東京：同文館出版，1997。
- 近藤正己，《総力戦と台湾——日本植民地崩壊の研究》，東京：刀水書房，1996。
- 邱士杰，《一九二四年以前臺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臺北：海峽學術，2009。
- 長谷川貴彦、成田龍一、櫻井厚，〈座談会——個人史研究の現在、そしてエゴ・ドキュメントへ〉，《歴史評論》，777(東京，2015)，頁 6-32。
- 姚人多，〈認識臺灣——知識、權力與日本在台之殖民治理性〉，《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2(臺北，2001)，頁 119-182。
- 春山明哲、若林正丈編，《日本植民地主義の政治的展開一八九五-一九三四——その統治體制と臺灣の民族運動》，東京：アジア政経学会，1980。
- 柯志明，《米糖相剋——日本殖民主義下臺灣的發展與從屬》，臺北：群學出版社，2003。
- 柳書琴，〈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 1930 年代臺灣的讀書市場〉，《中外文學》，33：7(臺北，2004)，頁 19-55。
- 洪郁如，〈もう一つの「日本時代」——近現代台湾女性の識字とエンパワーメント〉，《中国語中国文化》，16(東京，2019)，頁 31-46。
- 洪郁如，〈読み書きと植民地——台湾の識字問題〉，《言語文化》，49(国立，2012)，頁 75-93。
- 洪郁如，〈戰爭記憶與殖民地經驗——開原綠的臺灣日記〉，《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4(臺北，2014)，頁 48-82。
- 洪郁如，《近代台湾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東京：勁草書房，2001。
- 洪廣冀，〈林學、資本主義與邊區統治——日治時期林野調查與整理事業的再思考〉，《臺灣史研究》，11：2(臺北，2004)，頁 77-144。
- 洪廣冀，〈從「臺灣之恥」到「發展最速的產業」——再思日治時期臺灣的科學林業與工業化〉，《臺灣史研究》，25：3(臺北，2018)，頁 83-140。

- 紀旭峰，《大正期台湾人の日本留学研究》，東京：龍溪書舎，2012。
- 若林正丈，〈「台湾島史」論から「諸帝国の断片」へ——市民的ナショナリズムの台湾史観一瞥〉，《思想》，1119(東京，2017)，頁 85-96。
- 若林正丈，〈台湾植民地支配〉，收入山根幸夫等編，《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入門》，東京：研文出版，1992，頁 277-311。
- 若林正丈，《台湾抗日運動史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83，增補版 2001。
- 若林正丈，〈「台湾研究」とは何か？〉，《日本台湾学会報》，1(東京，1999)，頁 1-3。
- 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
- 若林正丈、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臺北：播種者文化，2004。
- 若林正丈、松永正義、薛化元主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史研究論集》，板橋：稻鄉出版社，2008。
-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 若林正丈、許佩賢譯，〈試論如何建立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的研究——戰後日本研究成果的一個反思〉，收於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 273-284。
- 范燕秋，〈癩病療養所與患者身分的建構——日治時代臺灣的癩病社會史〉，《臺灣史研究》，15：4(臺北，2008)，頁 87-120。
- 范燕秋，《疫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臺灣醫學史》，板橋：稻鄉出版社，2005。
- 宮崎聖子，《殖民地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8。
-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共休閒與休閒近代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9)。
- 涂照彥，《日本帝国主義下の台湾》，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5。
-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1999。
- 翁佳音，《臺灣漢人武裝抗日史研究(1895-190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6。
- 酒井哲哉、松田利彥編，《帝國日本と植民地大学》，東京：ゆまに書房，2014。

- 張炎憲，〈日治時代臺灣史的研究定位〉，《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6(臺北，1993)，頁 10-14。
- 張炎憲、吳密察、柯志明、陳芳明、林瑞明、吳文星座談，柳書琴、許佩賢紀錄整理，〈日治時代臺灣史研究之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26(臺北，1993)，頁 15-47。
- 張素芬，〈移民與山豬的戰爭——國家政策對生態的影響(1910-1930)〉，《師大臺灣史學報》，4(臺北，2011)，頁 95-127。
- 張素芬，〈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9-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
- 張素芬，《未竟的殖民——日本在臺移民村》，新北：衛城出版，2017。
- 張隆志，〈後殖民觀點與臺灣史研究——關於臺灣本土史學的方法論反思〉，收入柳書琴、邱貴芬主編，《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臺灣文學場域》，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頁 359-383。
- 張隆志，〈國家與社會研究的再思考——以臺灣近代史為例〉，《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4(臺北，2006)，頁 107-128。
- 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臺灣史研究》，16：4(臺北，2009)，頁 161-184。
- 郭珍弟、簡偉斯導演、製作，《跳舞時代》臺北：公共電視台，2003。
- 曹永和，〈臺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臺灣島史」概念〉，《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5(臺北，1990)，頁 7-9。
- 梁華璜，《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板橋：稻鄉出版社，2001。
- 莊勝全，〈《臺灣民報》的生命史——日治時期臺灣媒體的報導、出版與流通〉，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7。
- 莎拉·瑪札(Sarah Maza)著，陳建元譯，《想想歷史(*Thinking About History*)》，臺北：時報文化，2018。
- 許世楷，《日本統治下の台湾——抵抗と弾圧》，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2。
-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
-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1930 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新北：衛城出版，2015。
- 許雪姬，〈「臺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22：1(臺北，2015)，頁 153-184。
- 許雪姬，〈在「滿洲國」的臺灣人高等官——以大同學院的畢業生為例〉，《臺灣史研

- 究》，19：3(臺北，2012)，頁 95-150。
- 許雪姬編，《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
- 許雪姬，〈臺灣史研究三部曲——由鮮學經顯學到險學〉，《思想》，16(臺北，2010)，頁 71-100。
- 許雪姬、黃子寧等訪問，藍瑩如等紀錄，《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
- 郭杰、白安娜原著，李隨安、陳進盛譯，許雪姬、鍾淑敏主編，《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
- 陳文松，《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 陳玉箴，〈食物消費中的國家、階級與文化展演——日治與戰後初期的「臺灣菜」〉，《臺灣史研究》，15：3(臺北，2008)，139-186。
- 陳何著、劉士永主編，《陳何女士助產學筆記》，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2017。
- 陳延媛，〈在殖民地臺灣社會夾縫中的朝鮮人娼妓業〉，《臺灣史研究》，17：3(臺北，2010)，頁 107-149。
- 陳延媛，〈放眼帝國、伺機而動——在朝鮮學醫的臺灣人〉，《臺灣史研究》，19：1(臺北，2012)，頁 87-140。
- 陳延媛主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底層社會——臺灣與朝鮮》，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8。
- 陳芳明，《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臺北：麥田出版，1998。
- 陳柔縉，《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麥田出版，2005。
- 陳偉智，《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 陳培豐，〈從三種演歌來看重層殖民下的臺灣圖像——重組「類似」凸顯「差異」再創自我〉，《臺灣史研究》，15：2(臺北，2008)，頁 79-133。
-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本統治下台湾の国語教育史再考》，東京：三元社，2001。
- 陳惠雯，《大稻埕查某人地圖——大稻埕婦女的活動空間近百年來變遷》，蘆洲：博揚文化，1999。
- 陳慈玉主編，《地方菁英與臺灣農民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

- 陳翠蓮，《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一九二〇-一九五〇》，臺北：曹永和王教基金會，2008。
- 曾士榮，〈戰爭動員、日常生活與臺灣女性——以《阮木筆日記》為中心〉，收入陳芳明、吳佩珍編，《東亞文學的實像與虛像》，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頁169-193。
- 曾山毅，《殖民地台灣と近代ツーリズム》，東京：青弓社，2003。
- 曾品滄，〈日治時期臺灣菜譜的演進與東亞食文化的跨境流動〉，《臺灣史研究》，25：3(臺北，2018)，頁43-82。
- 曾品滄，〈餐桌上的戰爭——日治末期臺灣的食物配給、黑市與殖民地社會〉，《新史學》，28：4(臺北，2017)，頁1-48。
-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職業婦女〉，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
- 游鑑明，《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 游鑑明著，大澤肇譯，〈受益者か、それとも被害者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の台湾人女性(1937-1945)〉，收於早川紀代編，《殖民地と戦争責任》，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頁78-100。
- 黃昭堂，《臺灣總督府》。東村山：教育社，1981。
-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臺北：麥田出版，2004。
- 楊雅慧，〈日據末期的臺灣女性與皇民化運動〉，《臺灣風物》，43：2(臺北，1993)，頁69-71。
- 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臺北：時報文化，1993。
- 葉肅科，《日落臺北城——日治時代臺北都市發展與臺人日常生活(1895-1945)》，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3。
- 溫振華，〈二十世紀初之臺北都市化〉，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86。
- 趙祐志，〈日人在台企業精英的社會網絡(1895-1945)〉，臺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5。
- 劉士永，〈「清潔」、「衛生」與「保健」——日治時期臺灣社會公共衛生觀念之轉

- 變》，《臺灣史研究》，8：1(臺北，2001)，頁 41-88。
- 蔡玉慧編著，吳玲青整理，《走過兩個時代的人——台籍日本兵》，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
- 蔡石山編著，《滄桑十年——簡吉與臺灣農民運動 1924-1934》，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2。
- 蔡采秀，〈從日治到戰後的臺北(1895-1985)——一個都市性質轉變的歷史過程分析〉，《臺灣史研究》，3：2(臺北，1996)，頁 5-50。
- 蔡培火、林柏壽、陳逢源、吳三連、葉榮鐘著，《臺灣民族運動史——日據時代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叢書編輯委員會，1971。
- 蔡錦堂，〈再論「皇民化運動」〉，《淡江史學》，18(淡水，2007)，頁 227-245。
- 蔡錦堂，《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的宗教政策》，東京：同成社，1994。
- 鄭政誠，《臺灣大調查——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之研究》，蘆洲：博揚文化，2005。
- 鄭麗玲採訪撰述，《臺灣人日本兵的戰爭經驗》，板橋：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
- 鄭麗榕，〈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以臺北圓山動物園為主的探討〉，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3。
- 鄭麗榕，《文明的野獸——從圓山動物園解讀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新北：遠足文化，2020。
- 駒込武，〈コメント「帝国史」研究の射程〉，《日本史研究》，452(京都：2000)，頁 224-231。
- 駒込武，《世界史のなかの台湾植民地支配——台南長老教中学校からの視座》，東京：岩波書店，2015。
- 駒込武，《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
- 駒込武著，吳密察、許佩賢、林詩庭譯，《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文化統合》，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
- 盧修一，《日據時代臺灣共產黨史(1928-1932)》，臺北：前衛出版社，1989。
- 戴國輝編著，《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と資料》，東京：社会思想社，1981。
- 檜山幸夫，〈日本における台湾史研究の現状と課題〉，收於台灣史研究部會編，《台灣的近代と日本》，名古屋：中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03，頁 15-66。
- 濱下武志，〈歴史研究と地域研究——歴史にあらわれた地域空間〉，收於濱下武志、辛島昇編，《地域史とは何か》，東京：山川出版社，1997，頁 16-52。
- 磯村生得，《われに帰る祖国なく——或る台湾人軍属の記録》，東京：時事通信社，

1981。

磯村生得，《青春不再來——台灣人の從軍記》，東京：磯村生得，1978。

薛化元、川島真、洪郁如主編，《跨域青年學者臺灣與東亞近代史研究論集》，新北：稻鄉出版社，2016。

謝里法，《日據時代臺灣美術運動史》，臺北：藝術家出版，1981。

鍾淑敏，〈日據初期在台的日本人〉，《史原》，17(臺北，1989)，頁 211-248。

鍾淑敏，〈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統治權的確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鍾淑敏，〈日據時期的官營移民——以吉野村為例〉，《史聯雜誌》，8(南投，1986)，頁 74-84。

鍾淑敏，〈政商與日治時期東臺灣的開發——以賀田金三郎為中心的考察〉，《臺灣史研究》，11：1(臺北，2004)，頁 79-117。

鍾淑敏，〈戰前臺灣人英屬北婆羅洲移民史〉，《臺灣史研究》，22：1(臺北，2015)，頁 25-80。

顏杏如，〈植民地都市台北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生活文化——「空間」と「時間」における移植、変容〉，東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論文，2009。

顏杏如〈與帝國的腳步俱進——高橋鏡子的跨界、外地經驗與國家意識〉，《臺大歷史學報》，52(臺北，2013)，頁 251-302。

羅欣怡主編，物質文化專題，《歷史臺灣》，7(臺南，2014)。

藤井省三、黃英哲、垂水千惠編，《台湾の「大東亜戦争」——文学・メディア・文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2。

藤森智子，《日本統治下台湾の「国語」普及運動——国語講習所の成立とその影響》，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6。

蘇碩斌，〈觀光／被觀光——日治臺灣旅遊活動的社會學考察〉，《臺灣社會學刊》，36(高雄，2006)，頁 167-209。

蘇碩斌，《看不見與看得見的臺北——清末至日治時期臺北空間權力模式的轉變》，新店：左岸文化，2005。

蘇碩斌策劃，江昺崙、吳嘉宏等著，《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臺北：衛城出版，2017。

顧雅文，〈1930-1960 年金雞納與奎寧在臺生命史——時空特徵與意義轉化〉，《新史

學》，27：3(臺北，2016)，頁 177-226。

顧雅文，〈日治時期臺灣的金雞納樹栽培與奎寧製藥〉，《臺灣史研究》，18：3(臺北，2011)，頁 47-91。

Matsuda, Hiroko. *Liminality of the Japanese Empire: Border Crossings from Okinawa to Colonial Taiw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8.

Wu, Rwei-Ren. "The Formosan Ideology: Oriental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1895-1945." Ph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3.

二、網路資料

日本臺灣學會，〈日本台湾学会設立趣意書〉，<http://jats.gr.jp/shuisho.html>，擷取日期：2019 年 11 月 20 日。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本所介紹〉，<https://www.ith.sinica.edu.tw/about.php?l=c&no=15>，擷取日期：2019 年 11 月 20 日。

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http://thrp.ith.sinica.edu.tw/index.php>，擷取日期：2019 年 11 月 20 日。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Hsin-ju Y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historical studies o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over the last thirty years. This article aims to sketch trends seen in research topics and approaches, in the academic environment interweaving with external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and in overcoming internal research questions. This review article also highlights academic communities' activities, the research topics they pursu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influence and the knowledge they produced.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after 1990 there emerged challenges to the received historical viewpoints of binary opposition based on the official nationalism, while interests in themes of "modernization" and of "subjectivity" also came to the fore. In Japan, research fields such as Taiwan Studies and Japanese Imperial History Studies were on the rise. After 2000, international dialogues concerning the concept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spired many studies. Meanwhile, disparate perspectives on "colonial modernity" led to understanding of its historical complexities. With the developments of collecting common people's historical material resources and of documenting oral histories, as well as the trend of

rethinking Japanese “imperial history” from new perspectives, academic circles in Japan and Taiwan shifted focus to emphasize the Taiwanese responses in local society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verse historical actors. Despite the visible exploitation and suppression, recent studies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working of invisible and disciplinary power and intellectual hegemony that silently penetrated daily life, and revisit the context of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its relation with governmentality.

The conclusion borrows the ideas of “the history of whom?”, “the history of where?”, and “the history of what?” from Sarah Maza’s *Thinking about History*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trajectory and changes in historical studies o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Having reviewed the current state of field, this article would like to invite readers to work together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Keywords: Taiwan history, Japanese imperial history, academic communities, knowledge production, research review